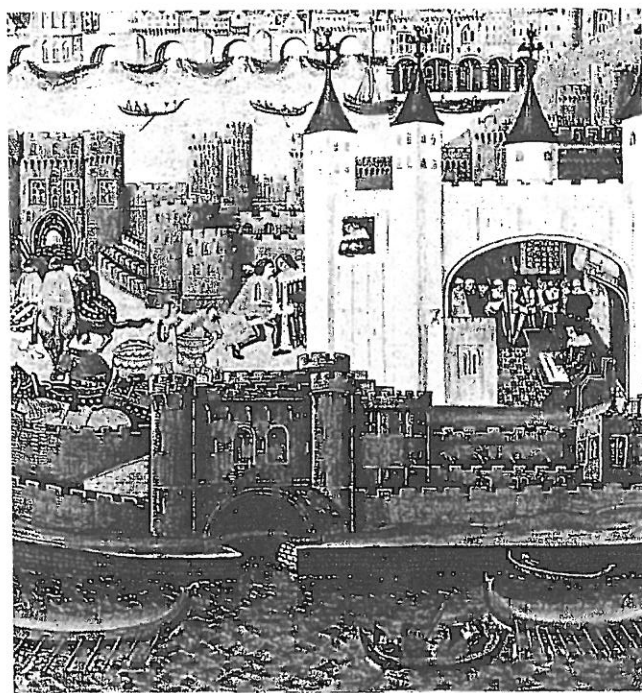


西洋文化史譯叢①

西洋中古史

C. Warren Hollister 著

張學明 譯



西洋文化史譯叢

西洋中古史

張學明 · 譯

聯經



曾有一段相當漫長的時間，歐洲人回顧他們由五〇〇到一五〇〇年的歷史，視其為人類意識「半夢半醒」的失落的一千年。中世紀，或者中古，論者甚至直呼「黑暗時代」而不名。

今天，歷史學家不再相信此說。各領域裡多種視角且層層出新的研究，顯示中古歐洲其實含有極為豐富的創造力。中古初期與晚期殊不可同日而語。當其結束之際，具備了近代許多器物發明與心態特徵的歐洲人已經開始向五洲四海推進，並且從此在科技、政治制度與經濟組織方面領先地球上其他文明。

本書一九六四年初版以來，歐美大學採用為教本，風行不墜。二十年中數經再版，各次都配合當時中世紀研究在政治、經濟、社會、思想及文化方面的最新發現與最新見解而增訂。本版為一九七八年版，亦不例外，擇要收入市鎮生活、猶太社羣、地主貴族、農民生活、教會生活及大學生活的第一手原始資料，更加充實，其餘細節亦不煩修改，許多重點更全段重寫，允稱當今最佳中世紀通史。

作者賀力斯特，現任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史學教授，本工英國中古史，為倫敦皇家歷史學會研究員，兼任〔美國歷史評論〕(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與〔中古史學報〕(Journal of Medieval History)及加州大學出版社編輯委員，並曾在劍橋、牛津、倫敦、雪梨、波隆納、莫斯科等大學授課。氏著作等身，包括 Anglo-Saxon Military Institutions on the Eve of the Norman Conquest (Oxford, 1962), The Military Organization of Norman England (Oxford, 1965), The Impact of the Norman Conquest (1969)，及課本：〔西洋上古史〕(Roots of the Western Tradition)，〔英國的形塑〕，(The Making of England)，以及本書〔西洋中古史〕等。

譯者張學明博士於一九七六年獲香港中文大學文學士學位(主修歷史、副修翻譯)，往加州大學從賀力斯特教授研究英國中古史之諾曼王朝，並分別於七七及八三年獲頒授碩士及博士學位。張博士現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教授西洋文化史、西洋上古史、及西洋中古史。

C. Warren Hollister著／張學明譯

西洋文化史譯叢①

西洋中古史

Medieval Europe : A Short History

原作者中譯本引言 (譯文)

拙著〔西洋中古史〕經數次修訂，過去二十年來，已為千百歐美大專院校採用作課本。現見中譯面世，至感欣慰，並望張學明博士此譯本對廣大新讀者有所裨益。

承張博士翻譯拙著，深感榮幸，謹致謝忱。

美國加州大學歷史系教授

賀力斯特 (C. Warren Hollister)

一九八六年一月二十一日

Medieval Europe: A Short History
by C. Warren Hollister
John Wiley & Sons, 1978, 4th edi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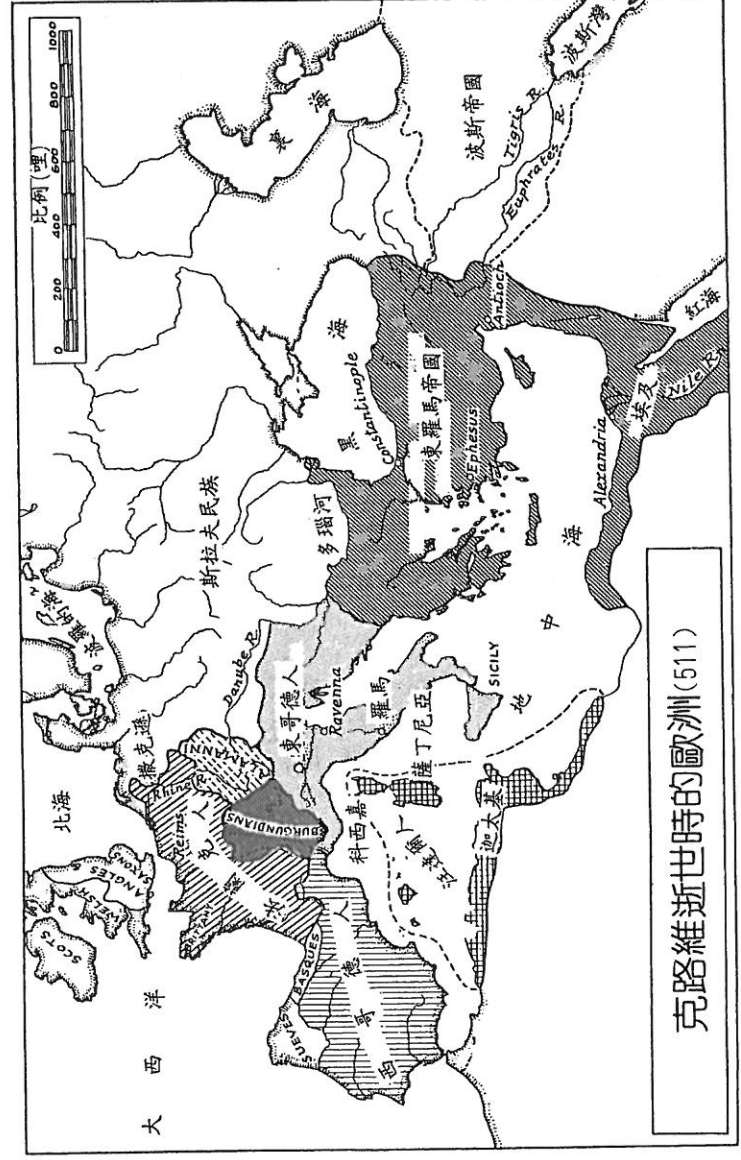
譯序

加州大學的賀力斯特教授 (Professor C. Warren Hollister) 與其他中古史學家在過去十數年間，不斷研究與刊載論文及書籍，改變了學界對歐洲中古時代的看法；現在大多數學者都因而明瞭歐洲的中古時代並不「黑暗」；反之，我們可以看到歐洲中古光輝的真正面目。這本〔西洋中古史〕(Medieval Europe) (1978年，第四版) 是賀力斯特教授的代表著作之一，內容充實，結構簡潔而精密，是很多美國大學研讀西洋中古史所採用的課本。譯者在加州大學研究院跟隨賀力斯特教授數年，現在希望介紹這本名著給中國讀者。讀者或因此會對西洋中古時代的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歷史，有進一步的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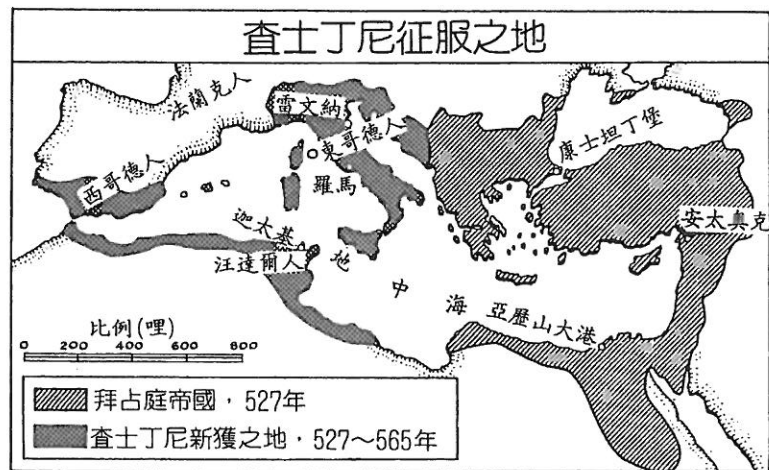
本書在翻譯過程中，蒙在美國的賀力斯特教授、在香港的孫述宇教授、遼耀東教授伉儷、在臺灣的張朋園教授伉儷、黃寬重教授、及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林載爵與方清河等編輯先生的支持、鼓勵，在此一併致謝。此外，亦要多謝林結萍、余凱旋、梁寶琦等諸位同學協助抄稿，使這本書能如期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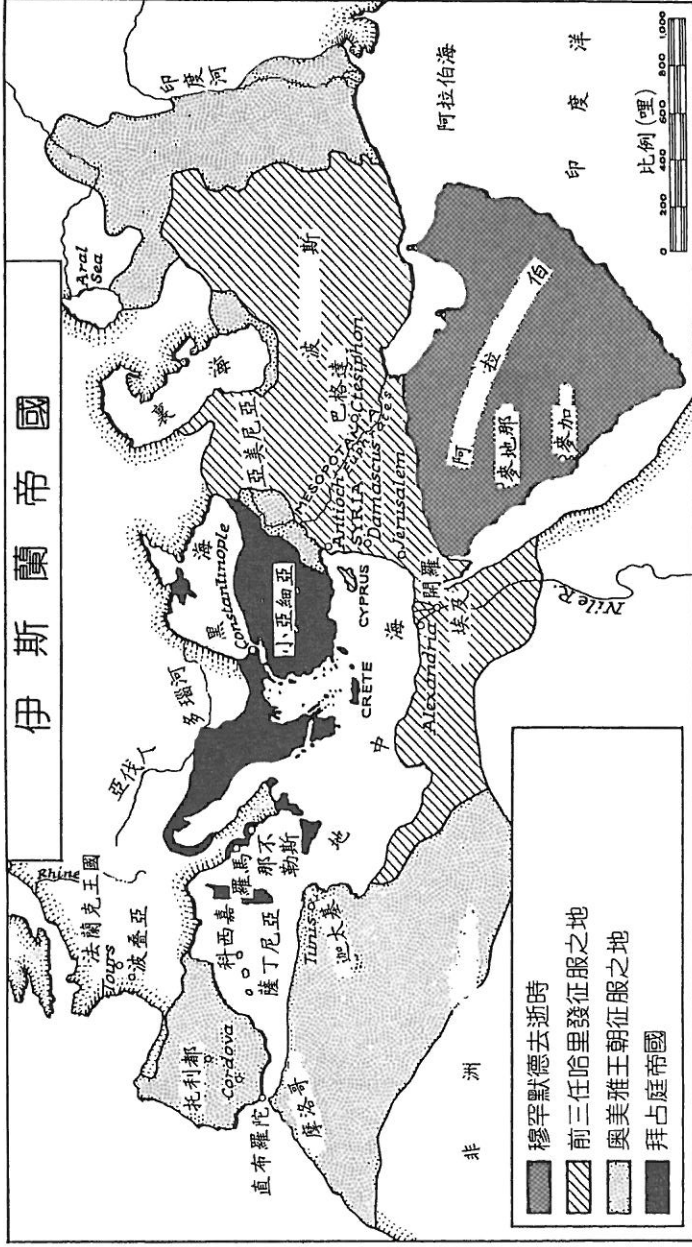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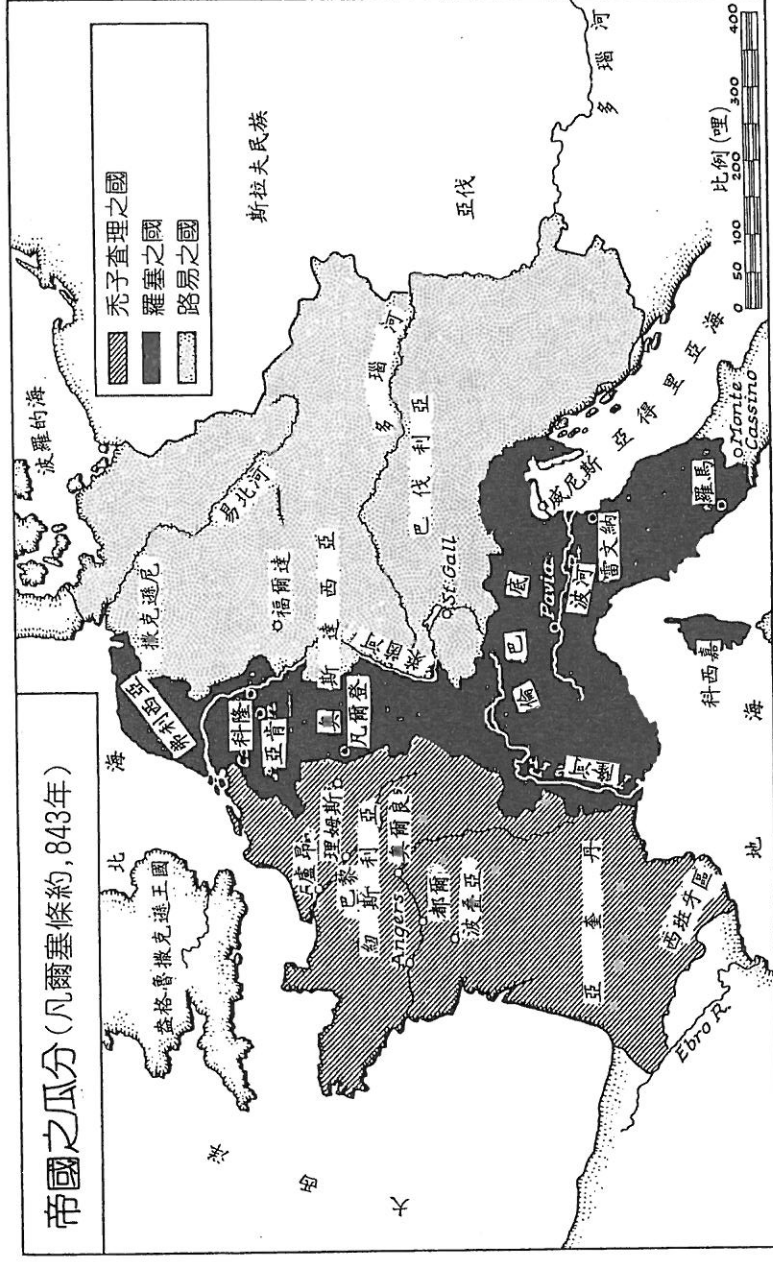
張學明

一九八五年於香港



克路維逝世時的歐洲(511)



[illegible][illegible]

維京人、匈奴人及回教徒的入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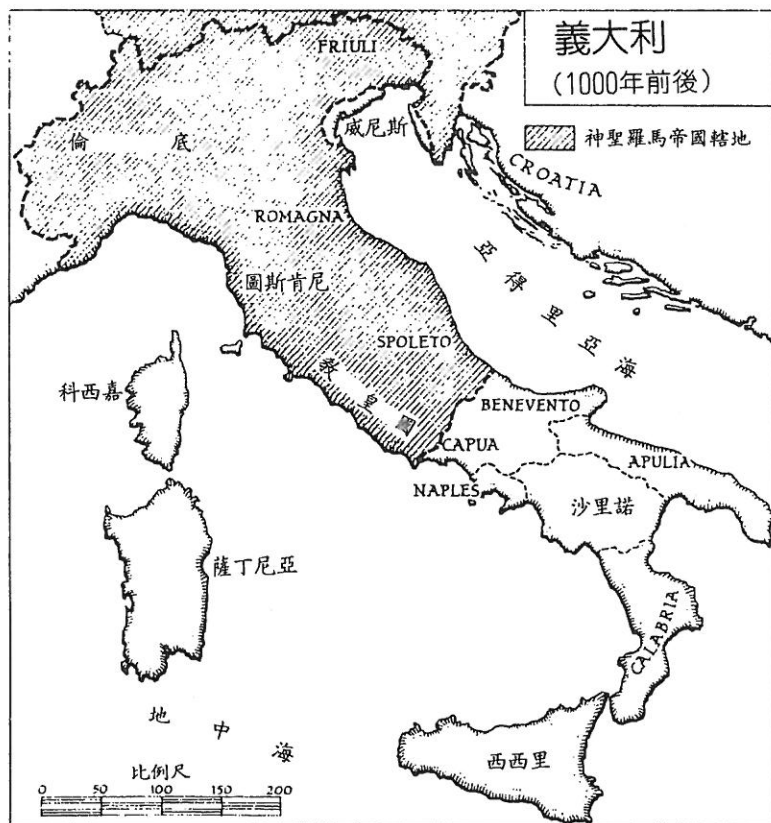
This map illustrates the invasions of Europe by Vikings, Muslims, and Hungarians. The legend indicates:

- Solid line with arrow: 維京人 (Vikings)
- Dashed line with arrow: 回教徒 (Muslims)
- Dotted line with arrow: 匈奴人 (Hungarian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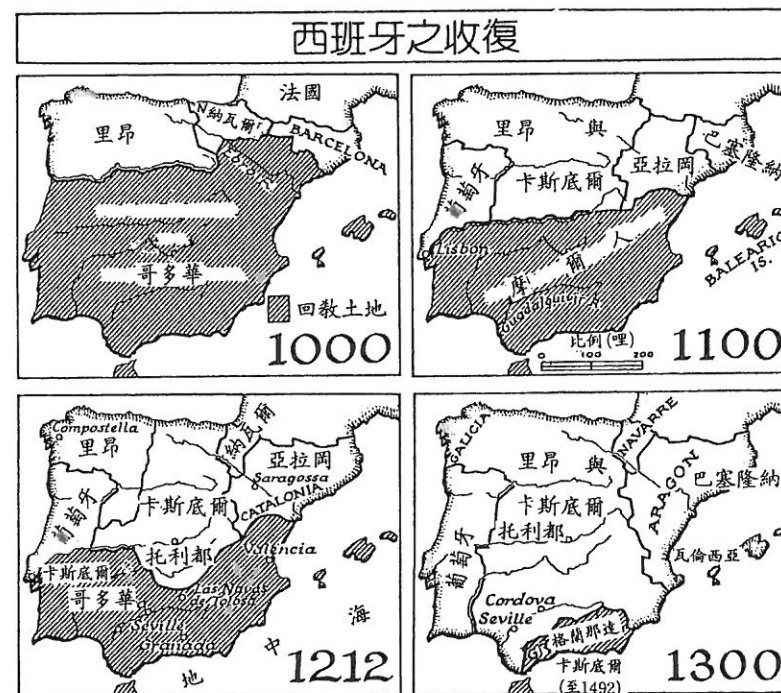
 Key locations and features includ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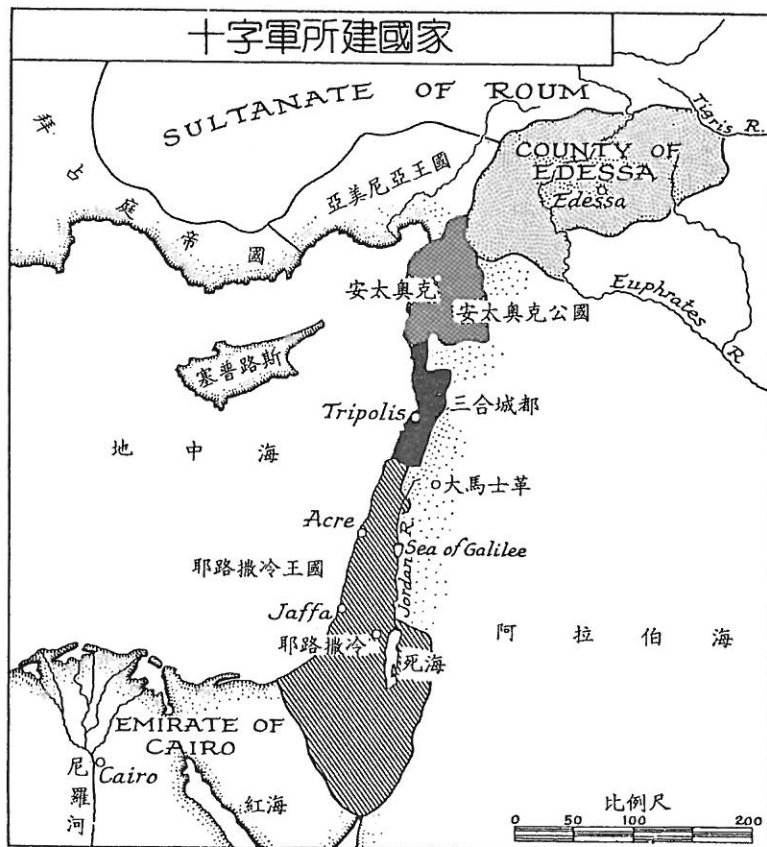
- Vikings:** Originating from the north (Iceland, Scandinavia), they invaded the British Isles (Scotland, Ireland, Wales, England), the North Sea, and the Mediterranean coast (Normandy, Sicily, Calabria).
- Muslims:** Invaded from the south (North Africa, Sicily, Calabria) into the Italian Peninsula (Puglia, Basilicata, Campania) and the Balkans (Thrace, Bulgaria).
- Hungarians:** Invaded from the east (Carpathian Basin) into the Danube region (Austria, Hungary, Czech Republic, Slovakia).
- Other Labels:** Iceland (冰島), Scotland (SCOTLAND), Ireland (愛爾蘭), Wales (威爾斯), England (英倫), Normandy (諾曼底), Paris (巴黎), Rouen, Aachen, Loire, Seine, Rhine, Danube R., Kiev, Black Sea (黑海), Constantinople (君士坦丁堡), Monte Cassino, Naples, Sicily (西西里), Sardinia (科西嘉), Provence, Lombardy (倫巴底), and the Mediterranean Sea (地中海).

 A scale bar at the bottom right shows distances in miles (哩): 0, 200, 400, 600, 8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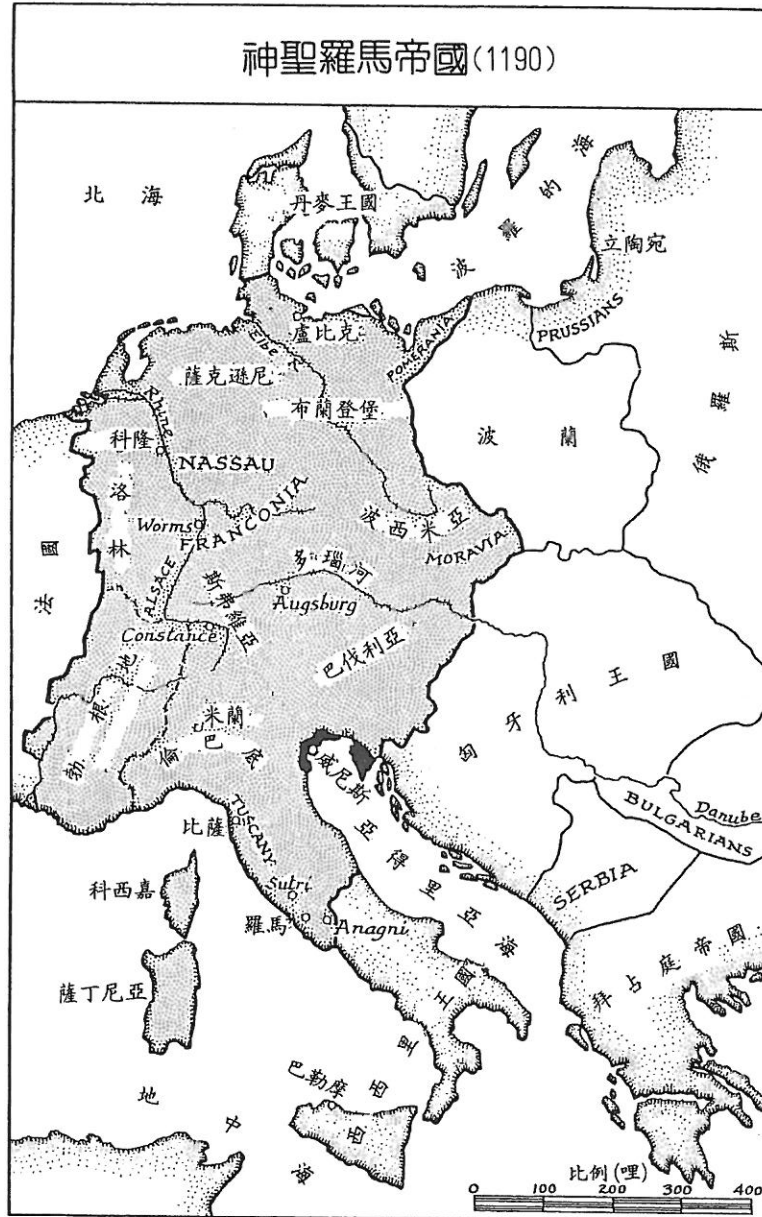


Italy, C.1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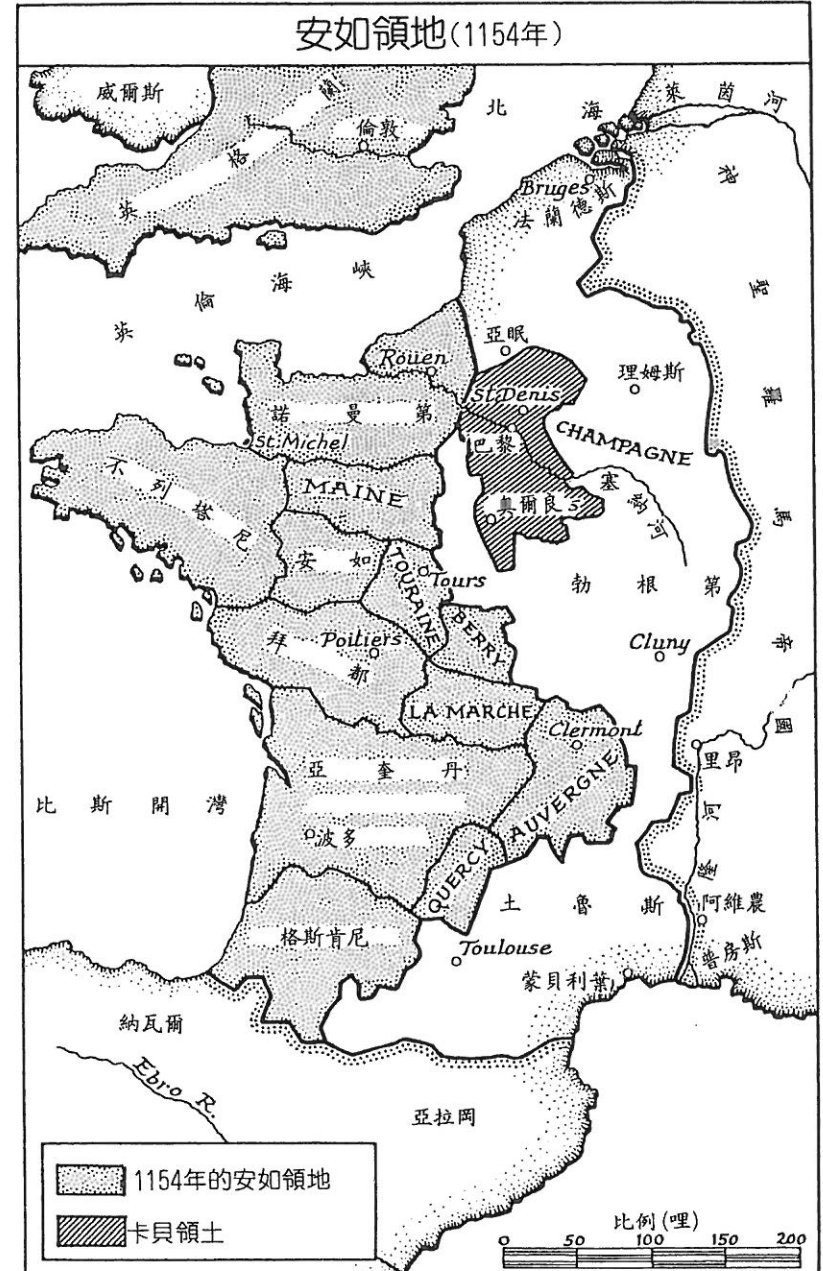




神聖羅馬帝國(1190)



安如領地(1154年)



法國王畿之擴張

The figure consists of four maps of France, each representing a different year in the history of the French monarchy, showing the growth of the royal domain (the area shaded in dark grey).

- 1154:** The map shows the initial extent of the Capetian domain. Key regions labeled include Normandy (諾曼底), Flanders (佛蘭德斯), Champagne (香檳), Anjou (安茹), Maine (梅恩), Touraine (圖賴), Poitou (普瓦圖), and Auvergne (奧弗涅). The year 1154 is prominently displayed at the bottom left.
- 1223:** This map shows significant territorial gains. The domain has expanded to include Brittany (布列塔尼), Gascony (加斯科涅), and parts of the south. The year 1223 is prominently displayed at the bottom left.
- 1270:** The domain has grown further, incorporating Languedoc (朗格多克) and other southern territories. The year 1270 is prominently displayed at the bottom left.
- 1314:** The final map shows the domain at its peak before the Hundred Years War. It includes almost all of France, from the English Channel in the north to the Pyrenees in the south. The year 1314 is prominently displayed at the bottom left.

Throughout the maps, various cities and regions are labeled in Chinese, including Paris (巴黎), Rheims (雷恩), and others. The shaded areas represent the lands directly controlled by the French king, while unshaded areas represent lands held by vassals or other powers.

義大利
(1490前後)

SWISS CONFEDERATION

Carinthia

Carniola

提洛

特倫特

薩伏依

米蘭

Verona

帕度亞

蘭

MANTUA

波隆納

FERRARA

威尼斯

Genoa

熱那亞

波隆納

Florence

比薩

Lucca

佛羅倫斯

Siena

西安那

Urbino

馬切拉

亞得里亞海

Palmaria

羅馬

Umbria

教皇國

納不勒斯

兩西西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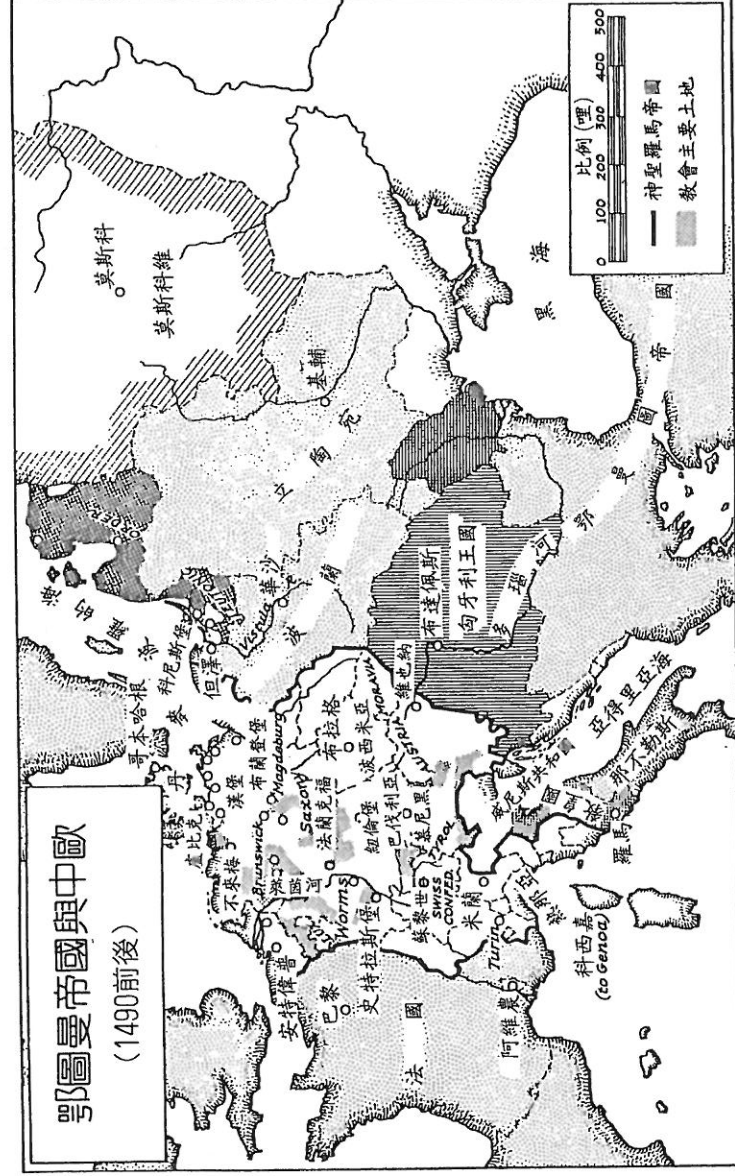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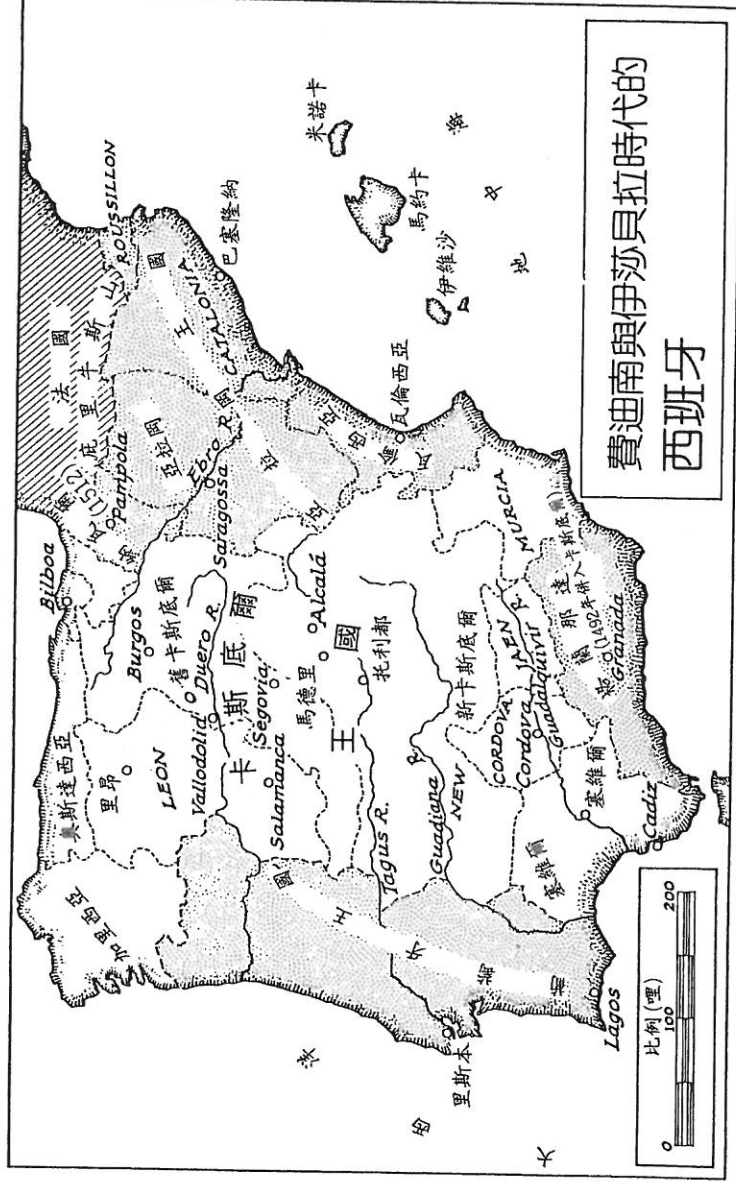
Otrant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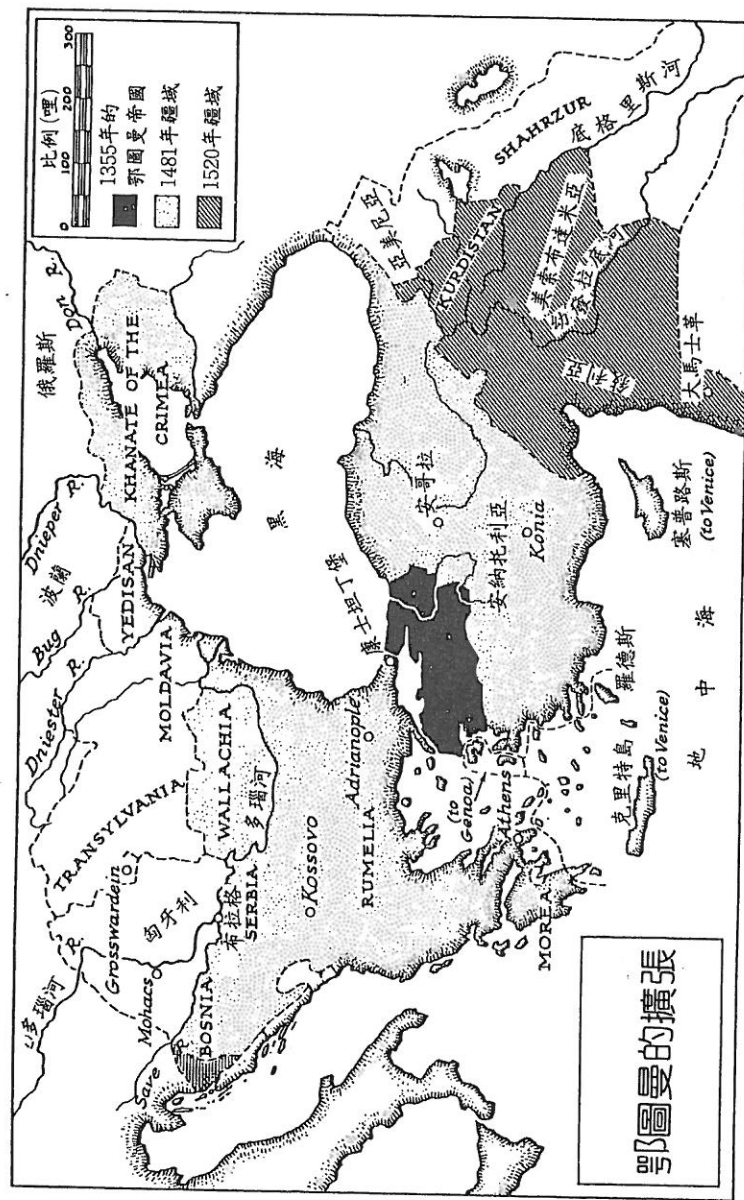
王國

巴勒摩

比例 (哩)

0 100 200





目錄

原作者中譯本引言 (譯文)	i
譯序	iii
前言	1

第一部 中古初期

第一章 羅馬帝國皈依基督教	5
第二章 西羅馬帝國的沒落	15
第三章 東羅馬帝國 (拜占庭) 的延續	27
第四章 初期的西方基督教世界	39
第五章 伊斯蘭的勃發	51
第六章 卡洛林王朝的歐洲	65
第七章 新的侵略	89
第八章 劫後餘生的歐洲	99

第二部 中古高峯期

第九章 城市、鄉野與領域	127
第十章 中古基督教的新境界	167
第十一章 帝國與教廷	189

第十二章 英國與法國.....	217
第十三章 文學與藝術.....	251
第十四章 知識世界.....	271
第三部 中古晚期	
第十五章 十四與十五世紀的教會與國家.....	303
第十六章 經濟與文化的轉變.....	325
索引.....	341

前言

一個世紀以前，幾乎人人都為中古時代惋惜：西元五〇〇年至一五〇〇年被視為人類進步歷史上一段漫長而沒有目標的歧途——一千年的窮困、迷信及黑暗，分隔著羅馬帝國的舊黃金時代及義大利文藝復興的新黃金時代。一位十九世紀的歷史學家指出，在這千年中，人類的意識「半夢半醒」：沒有什麼大事發生，沒有人有獨特的見解，整個社會由愚昧的教士控制。某十九世紀作家譴責中古是「沒有洗過澡的一千年」。對大多數人，中古只是所謂「黑暗時代」。到十五世紀，黑幕總算拉起，歐洲才醒來，洗個澡，重新思想並創造。經過漫長的中古間斷，人類又再邁向進步。

今天的歷史學家不再相信中古是一場呂伯大夢的理論。最近幾世代的研究顯示，中古的社會不斷演變，一三〇〇年的歐洲與六〇〇年的歐洲實在有很大的分別。歷史學家現在都明白中古歐洲極具創造力。到中古晚期（約西元一五〇〇年左右），歐洲的科技、政治與經濟組織已經決定性地勝過地球上的其他文明。哥倫布發現美洲大陸；葡萄牙人繞過非洲，到達印度；歐洲發展槍炮、印刷機、機動鐘錶、眼鏡、蒸餾酒精，以及其他無數近代文化的成分。

一五〇〇至一九四五年間的「近代」世紀，歐洲的艦隊、軍隊及思想不斷擴展，並且改變全球。甚至今天，很多

獨立而不屬歐洲的國家仍深受這些科學、醫學、經濟、政治及社會法治影響。美國、印度、日本、以色列及很多其他非歐洲國家的立法制度，都起源歐洲中古時代的議會與集會制度。而中共、蘇聯、古巴等地的共產主義制度也是根據西歐觀念而來，這些觀念，有的可以追溯到馬克思以前幾位中古作家的激進思想。例如，一三八一年，作亂的英國農民抨擊既有社會秩序，使用的就是一句無階級社會的口號：「亞當掘土而夏娃織布之日，誰是紳士？」

總之，我們若想明瞭歐洲如何改變近代世界歷史而塑造今日的全球文化（先不論此事是福是禍），必須研讀歐洲中古時代的幾個世紀，才能找到答案關鍵處，因為歐洲在這段期間由未開發的赤貧鄉野，演變成強而有力的文化。這也正是本書要介紹給大家的一段歷史。

第一部 中古初期

第一章 羅馬帝國皈依基督教

羅馬「黃金時代」及其演變

第一與第二世紀，羅馬帝國全盛期間，羅馬皇帝統治著廣大的領域，西起大西洋，東至阿拉伯沙漠，北及英國北部，南達薩哈拉沙漠，一片太平。當然，並非每一個皇帝都是偉大的統治者。其中幾位是愚鈍的，一兩位顯然瘋狂。第一世紀的卡里古拉（Caligula）喜愛在宮廷宴會上讓他的愛駒又喝又吃，還打算把這匹畜牲擢升為羅馬的執政官。暴君尼洛（Nero, r. 37-68）更不待言。不過，很多皇帝英明而有遠見；甚至在最壞的皇帝統治下，政府仍能繼續有效施政。羅馬的軍團保衛著遙遠的邊疆，鋪石的道路使羅馬控馭各省；羅馬的船隻在地中海完全不會受到海盜或敵艦的干擾。帝國全境散佈著古典羅馬風格的寺廟、公所、浴室、學校、圓形劇場、鬥技場及凱旋門。此等遺跡，地中海沿岸與地中海以外地區——義大利、法國、西班牙、英國、北非、巴爾幹及近東等地——仍可見到，見證了羅馬政治權威的廣大範圍，以及羅馬建築頗具品味的獨特劃一色彩。

羅馬黃金時代的文化取源希臘之處甚多，令前幾世紀的史學家十分著迷。他們認為人類從來不曾生活得像羅馬全盛時代那般快樂。他們將羅馬的覆亡視為最大的歷史浩劫——

是野蠻與宗教的勝利。但今天，史學家有另一種看法。羅馬的古典文化雖美，但也十分狹窄——只有帝國的上層階級能享受。又，其人民雖受益於太平與相當程度的有效率統治，然大部分仍是赤貧的。婦女沒有政治權利，在家要遵從及服侍丈夫。很多男女都是奴隸。就從這些方面來看，羅馬的文化並不劣於、但亦不優於其他古代文化。

時移勢易，上層階級的羅馬古典文化逐漸凋落，久已醞釀瀰漫於帝國民間的風格與希望代之而起。當這些潛藏的觀念浮現於表面，第一、二世紀的精英文明亦逐漸蛻變。藝術、文學、帝國禮儀及政治思想與結構都發生根本改變。不過，從後世的歷史觀點來看，意義最重大的改變還在宗教態度的改變。

新的宗教氣氛

第三、四世紀，羅馬帝國飽受野蠻民族侵襲及經濟困擾，城市裏的貧苦大眾愈來愈脫離狂暴的傳統奧林匹克神明——如丘比特（Jupiter）、朱諾（Juno）、阿波羅（Apollo）、智慧女神（Minerva）及其他的神——而轉向動人心魄，要使個人解脫罪惡、而且保證個人得救與永生的新宗教。這些新的「神秘宗教」並不是羅馬或希臘所有，而是由羅馬帝國已經吸收的古老東方文化發源而來：埃及有繁殖女神（Isis）教派，波斯有救世太陽神（Mithras）教派，小亞細亞有大地母教派及巴勒斯坦的基督教。

奧林匹克諸神及女神繼續流傳一段時間，但形態已完全改變。第三世紀期間，這些異教崇拜的一切生命力已被融入一個名叫：「新柏拉圖派哲學」（Neoplatonism）的新哲學體系（基本上可以溯源到希臘哲學家柏拉圖的思想。）新柏

拉圖派哲學由第三世紀的哲學家普洛泰納斯（Plotinus，羅馬帝國最有影響力的哲人之一）所創。普洛泰納斯傳授的是「一神論」：該神是全能、不可知亦不可觸摸的（除了靠玄秘的經驗之外）。

這個神是萬物靈魂的肉身之源。一切事物皆如一連串的水波，自他向外散發。希臘早先表揚的人類理性已不再受重視，因為現在的神是在理性範圍之外。

儘管普洛泰納斯及其信徒奉玄秘的一神論，他們仍容納其他教派的無數神靈。他們認為這些異教神靈是他們所信奉的神的不同形式象徵。這些教派因而如獲新生。各教派都轉趨玄秘及一神論。丘比特與新的東方神靈的分別漸漸模糊。

基督教與羅馬帝國

在這玄秘與超自然的氣氛中，基督教獲得最後勝利。基督教擊敗其他教派的原因包括：（一）基督本身的鮮明、引人形象，（其他教派的「救世主」都是神話）；（二）基督教根據希伯來一神論的強力意念，（三）基督教歡迎婦女與奴隸入教；及（四）基督教講愛、恕及助人的倫理體系頗中人心。

早期的基督徒，因拒絕供奉官方的神靈而飽受羅馬當局迫害。三一二年，康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 306-337在位）皈依基督教，因而大大改善了基督教與羅馬帝國的關係。三一二年之前，基督教只受城市羣衆歡迎。他們覺得比較容易接納一個本身是木匠而常與漁民、妓女往來的救世主。又，基督被羅馬帝國官員釘死在十字架上，而且答應所有跟隨他的人——不論自由民或奴隸、男或女——獲救得永生。康士坦丁大帝皈依之後，基督徒便擴及富豪權貴及一系列的羅馬帝王。

因此，在第四世紀，我們看到愈來愈多人皈依基督教。基督教由一個蓬勃、專誠但屬於少數人的教派，擴展成地中海地區的最有力宗教。它不但不再受迫害，還更成為官方、自成傳統、受尊重的宗教。在擴展的過程裏，它喪失一些原有的精神強度，此外，全面的勝利也帶來一些內部分裂。第四世紀的基督教歷史充滿嚴厲的教義紛爭，而羅馬帝王也扮演著主要角色。第四世紀基督教異端中最強大的「亞里昂」教義(Arianism)就是由帝王壓制而消逝。亞里昂信徒信從基督的教義，但否認他的神性。此等信徒曾在教會內顯現相當勢力，後來，嚴守正統的皇帝狄奧多西亞一世(Theodosius I, 378-395 在位)譴責其教義、摧毀其勢力，奠定正統基督教為羅馬帝國的國教。誠然，狄奧多西亞把一切異教及羅馬的舊神列為不合法的教派，使這些教派漸漸成為回憶而已。

儘管正統基督教在第四世紀末已完全支配羅馬帝國，舊的異教仍延續潛在，而且有新的異教興起。又，雖然亞里昂教派被列為不合法，邊疆的野蠻部族則仍然信奉。此等野蠻民族於第四世紀中葉亞里昂教派盛行時皈依此教；後來狄奧多西亞一世的壓制並未能改變他們的信仰。因此，其後此等野蠻民族侵佔西歐時，他們不但與羅馬帝國的人民有文化之別，而且有極尖銳的宗教矛盾。

康士坦丁大帝皈依基督教，令基督教獲益良多，但基督教也因而失去很多優點：基督教不再如以前那麼熱情，亦不像以前般獨立。基督徒對康士坦丁大帝之感謝，幾乎達到諂媚的程度，他被譽為基督的第十三個門徒，是所有教堂的主人、及直隸於神的君主。三二五年的全基督教會議，康士坦丁控制大局，並令該會議譴責亞里昂教義。隨後數十年間，亞里昂與正統基督教派鬥爭拉鋸——全依君主之喜惡立場而定。有時亞里昂教派的領袖、有時是正統基督教派的領袖被

放逐。當狄奧多西亞大帝最後全面壓制、譴責亞里昂教派，基督徒大感快慰。但他們亦應已了解他們的信仰是依附於帝王的喜惡。

拉丁博士

在基督教與希臘、羅馬文化漫長而重要的融匯過程中，康士坦丁的皈依基督教只是其中一個項目而已。他們的融匯可以溯源自較早時早期的基督徒學者是以希臘哲學表達其信仰。第四世紀末及第五世紀初的三位基督徒思想家——聖安布羅斯(St. Ambrose)、聖杰羅姆(St. Jerome)及聖奧古斯丁(St. Augustine)——的工作便反映著這種融匯，他們被譽為「拉丁教會的博士」。當羅馬帝國迅速基督化而古典文化仍未消失之際，他們用希臘、羅馬思想闡明基督信念。他們死後，西歐要經過七個世紀，才再回復古典文化的學術水平，因此，這三位拉丁博士的著述對其後數代影響實深而且遠。

安布羅斯、杰羅姆及奧古斯丁的影響雖主要在思想方面，然他們三人皆致力於當時的政治與教會事務。聖安布羅斯(約 340-397)是米蘭主教(米蘭是在北義大利的大城市，於第四世紀末取代羅馬而成為西羅馬帝國的首都。)安布羅斯是一位超卓的政務家、有說服力的演說家，又是強烈反對亞里昂教派的神學家。他在希、羅文化的文學及哲學傳統上有很好的底子，並向柏拉圖、西塞羅(Cicero)、味吉爾(Virgil)及其他古典異教學術巨人學習，以堅實他的基督教論述。他也是脫離羅馬帝國威權而獨立的教會學者先鋒之一，成為後來深遠影響西方中古政教紛爭的根源人物。當狄奧多西亞一世屠殺反叛的賽薩洛奈加(Thessalonica)人

民時，聖安布羅斯把狄奧多西亞逐出米蘭教會，迫使狄奧多西亞道歉並懇求寬恕。這次皇帝的公開悔改，成為以後教會在信仰與道德問題上站在優越地位的先例。

聖杰羅姆（約 340-420）是三位拉丁博士中最具學術性的一位。他是一位困思的學者，走遍羅馬帝國，曾住在羅馬，後來在伯利恆創立一所修道院。他的修道士專心於抄寫古典原稿，此等工作在未來數世紀由無數修道士承繼著，長遠來說，使希、羅古典文化得以保存。現代世界實在要多謝杰羅姆及其繼承者的重要貢獻。

聖杰羅姆本身深受一大難題困擾：身為基督徒的他，可不可以埋首於異教文學巨人如荷馬及味吉爾、何瑞思（Horace）及西塞羅的論著？他曾有一惡夢，基督在夢中拒絕他的永生，曰：「你是一個西塞羅信徒，不是基督徒。」因而，他曾一度棄絕一切異教論著，但他實在太深愛古典文學。終於，他認為希、羅文學可以適當地用於基督的信仰中。

杰羅姆的最高成就是經文的評注及翻譯。他把希伯來文與希臘文聖經翻譯為拉丁文（西羅馬帝國及西歐中古時代的語文）。其成果就是一本天主教徒從此沿用的拉丁文聖經。翻譯了這本信實的拉丁經文，他對西方文化有決定性的貢獻。

希坡（Hippo）的聖奧古斯丁（354-430）是當代思想巨人。他的成就超越教會政務家聖安布羅斯及學者聖杰羅姆。因為聖奧古斯丁不但是一位政務家及學者，而且亦是一位偉大的哲學家。身任北非洲重要城市希坡主教，他深入了解當時的政治、宗教問題，而他的論著亦能針對時事。在其論著〔懺悔錄〕中，他訴說本身思想及道德修養的漫長、曲折路程，如何由年輕人的享樂主義轉入正統基督信仰。他希望他的文章能引導其他「迷途」的人（如他曾一度迷途），皈依基督教會。

奧古斯丁對當時威脅正統基督教的異端教義，論著浩瀚地全面攻擊。在其議論中，他檢視很多自此成為神學家所討論的中心問題——三位一體的性質、一個全善及全能的神創造了一個有邪惡的世界、教士的職權、以及自由意志與天意的配合。在其豐富的論著中，我們可以找到成為中古哲學及神學思想基礎的體系。

正如當代的其他思想家，奧古斯丁也努力融合古典及基督思想。他比其他人更成功地融合這兩種文化。他亦有杰羅姆的困擾：異教思想危及著他的基督信念。不過，他仍像杰羅姆般結論，認為一個好的基督徒雖不應享受異教論著，但他應可適當地使那些論著用於基督教信仰。因此，奧古斯丁引用柏拉圖及新柏拉圖派哲學作為新而深入的基督哲學體系基礎。有些學者甚至說奧古斯丁讓柏拉圖「受洗」了。誠然，十三世紀哲學家聖阿奎納斯（St. Thomas Aquinas）說：「受到柏拉圖學者影響的奧古斯丁，發現此等古典理論與信仰相符時，他便融而納之；此等理論與信仰分歧時，他則糾正之。」

柏拉圖哲學被列為「唯心主義」，因為他認為不可觸摸的意念比可以觸摸的事物重要得多。他相信，我們獲取真理，並不是由於我們觀察世間事物，而是由於我們在物質世界找到基本意念而作反省，猶如數學家工作於純數目中一樣。新柏拉圖學派引申柏拉圖的理論，視上帝為萬物之源及中心，並視自然世界為神的暗淡反映——一個根本不值一提的外緣波紋而已。

奧古斯丁用基督教義重整柏拉圖及普洛泰納斯的透視。如新柏拉圖派學者般，他認為物質世界沒有精神世界那麼重要、真實；不過，儘管如此，物質世界也是由一位善與愛的神所創。神創造第一對男、女時，希望他們及所有的後裔皆

得永生於天堂。但神不希望造一些「人類木偶」，神給予人類自由去選擇善（接納他的愛）與惡（拒絕他的愛）。亞當與夏娃選擇錯誤，人類失去了善良、無邪的本性，變成自私自利，遠離神。不過，神彌補了這樣的壞關係：把自己變為一個人——耶穌基督，受苦、受難、死亡而復活。亞當的原罪在基督化身成人及釘死在十字架的過程中得到補贖，人類因而又獲得永生的機會。

因此，基督徒生活的中心目標在於得到基督給予永生的機會。要達到這個目標，必須成為一個愛人而不自私的人，愛神及愛其他人，而奧古斯丁深信我們無力壓制我們的自私自利，我們只有依賴神的恩寵力量才成。他認為我們若沒有神的幫助，就無力成為愛人的人而進入天堂。因此，沒有人值得永生。不過，有些人得到神的愛寵力量支持，終於達成目標。

奧古斯丁最重要的論著〔上帝之城〕(*The City of God*)，主旨便是人類欲得永生，必須依賴神的恩寵。他因而奠立一整套既革命性而又影響深遠的基督教哲學。他推翻希、羅傳統的認為歷史不斷、無意義地重複，他認為歷史是一有意義的人、神關係過程，始於創世、經歷基督之化身成人而至世界末日。奧古斯丁不談經濟或政治歷史，只談道德。他認為歷史唯一決定性的力量是人類的道德性格，而唯一的目標是得永生於天堂。神對帝國的命運沒有興趣，除非它們會影響到人類精神的命運。而個體能否得永生，與帝國的勝負無關，主要關鍵在於得到神的恩寵而改良道德性格。因此，真正的歷史和國與國之間的鬥爭無關，主要在於國內及心靈內之善與惡鬥爭。

奧古斯丁把人類分為兩個對立類別：不是異教徒所分的羅馬人與野蠻民族，而是獲神寵愛的與不獲神寵愛的兩類。

前一類屬於「神的領域」，後一類屬於「俗世領域」。此二領域在人世間是很難分開的，但在死後的世界則有享受永生或永受處罰之別。因此，人類歷史的目的在於培養神的領域。

羅馬人從來不善於抽象思考，但奧古斯丁終於把拉丁哲學推展到自成家數的階段。他是西羅馬帝國最偉大的哲學家，而誠然，也是基督教史上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的「兩領域」理論，雖然常遭簡化及一再被闡釋，實影響以後一千多年西方的思想及政治。他的基督教柏拉圖主義控制了中古哲學，甚至十二世紀中葉之後至現今，仍是宗教思想的重要主流。他把神職人員與平民分開，亦常為天主教教義的基本原則。而他強調神之恩寵，在十六世紀更成為新教徒領袖感悟的重要根源。

由於奧古斯丁及其同期的安布洛斯及杰羅姆的努力，基督教文化穩固奠立在古典文化的基礎上。四三〇年，奧古斯丁逝世時，古典、基督教文化的融滙已大致完成。希、羅傳統能成為中古基督教及西洋文化的基礎，歸功於三位拉丁博士及其他同類學者證實基督徒亦可以同時是西塞羅學者。

第二章 西羅馬帝國的沒落

帝國的沒落與覆亡

三三〇年（即奧古斯丁逝世前一世紀），康士坦丁大帝在接連黑海及地中海的水道要塞，建立新的東都。這個城市位於希臘舊市拜占庭，康士坦丁改名為「康士坦丁堡」。幾個世紀之後，西羅馬帝國被日耳曼侵略者統治時，東部的康士坦丁堡便成為最大的都會，其帝國通常稱為「拜占庭帝國」。

自第三世紀末，羅馬帝國便常常由東、西二帝分治，至第四世紀末，羅馬帝國正式分裂為東、西兩部。自此，羅馬帝國雖仍被視為一整體，事實上，東半部則為康士坦丁堡的皇帝管治；西半部則由米蘭及其後的雷文納（Ravenna）（首都已不再是羅馬）——軍事要塞管治。

這個政治分裂，反映著文化與言語上的長久分歧。帝國的東半部主要是希臘語系，而西半部則是拉丁語系。東半部是有長久文化的希臘、巴爾幹、地中海東部土地及埃及；若與西半部的北非洲西部土地及西歐相比，文化實有很大的距離。又東部的城市亦比西部大，較多及較活躍。的確，西部的城市——包括羅馬——主要是軍事、行政、及文化中心而非商業樞紐。這些西部城市是經濟上的寄生蟲，吸取附近農業地區的收成，以人民的稅收來過活。因此，第五世紀日耳

曼民族全面進侵時，東帝國得以繼續存在，西帝國則覆亡。

關於羅馬的沒落與覆亡，通常有以下的解釋：荒淫、氣候的改變、壞的生態習慣、及基督教。其實這些解釋都並不合理。例如：東羅馬帝國比西部更基督化，卻能存在至十五世紀。又，羅馬最荒淫的記載是在其異教時代的全盛期。比較重要的是，羅馬未能改善其經濟；又第五世紀時，西部的帝王亦較東部的弱。

羅馬「沒落與覆亡」的謎可能永遠不會完全揭曉。事實上，羅馬本身並沒有覆亡。它只是作全面的軍事撤退，由西部較新、較貧乏的省份轉往東部較富有及較有文化的省份而已。羅馬的潮水退了，使西歐乾涸。

西部經濟的最致命弱點，可能是未能作內部發展，以配合帝國的擴張。西部並無大型工業，人民十分貧窮，未能構成大市場。工業產品低劣而其科技進度亦十分緩慢。西部的經濟，基本上一貫是農業的，而其農業技術在帝國的數世紀間並無多大進展。羅馬的犁耙是初型的，他們並無風車，水車也很少見。總之，羅馬的農業完全倚靠著牛及農民與奴隸的血汗。

經濟的枯竭也帶來人口的減少與貧窮。正當人力短缺及貧乏困擾著中層階級之際，軍隊與政府卻不斷擴張，稅捐亦不斷高漲。結果便是西歐城市的沒落。至第五世紀，曾經繁榮的市鎮變成了失去財富及人民的鬼墟。只有少數大地主仍過著繁華的生活，他們放棄城市，退至鄉間的勢力範圍，組織相當勢力的私有軍隊以對付稅務官員。此後一千年間，這些貴族退而為鄉農階級，中古時代的鄉農中堅、優秀份子遂正式產生。

城市的沒落致命地損害了西帝國的行政結構。更有甚者，希、羅古典文化的城邦時代也告一段落。雅典、亞歷山

大、羅馬的文化，皆成歷史。在這個城市社會的沒落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政治沒落與文化演變的關係。嚴格來說，希、羅文化早於西帝國覆亡之前就消逝了；四七六年最後的西帝王遜位，只是加上一個而已。當其時，城市已成廢墟，理性的古典氣氛亦已完全消失。甚至軍隊及政府都變得野蠻，因為絕望的帝王，在人力及資源短缺之下，只得愈來愈依靠日耳曼民族來防禦其邊疆及領土。最後，軍隊內充滿著日耳曼人，甚至整族人被僱以防禦邊疆，而日耳曼民族的軍事領袖甚至擔任西帝國的崇高、權威職位。帝國的存亡實賴於擔任邊防的日耳曼人能否抗拒入侵的日耳曼人。

不過，從另一觀點來看，希、羅文化在西方從未死亡。正如上文所說，希、羅文化深遠地影響著拉丁教會的博士，又經過這些博士而影響著中古時代的思想。希、羅文化是後世大小文化復興的基礎，例如：查理曼時代、中古高峯時代、義大利文藝復興，以及十八、十九世紀的新古典運動等。因此，一方面，我們可以說羅馬的國家在西帝國皇位終止的四七六年前很久，就已經死亡，另一方面，我們亦可以說它此後存活甚久——成為羅馬天主教會的教會組織及中古的神聖羅馬帝國。羅馬的法律仍繼續影響著西方的法律思想。拉丁語在未來一千多年裏一方面成為受教育的歐洲人的語言，另一方面，在低層社會裏演變成羅馬語系的各種語文：包括：義大利文、法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及羅馬尼亞文。豐富的古典文化遺產以無數形式，傳往中世紀。在未來的世紀裏，歐洲人一直受到希臘思想的滋潤，並且回顧著羅馬的時代。

日耳曼民族

中古歐洲的文化是綜合古典、基督教與日耳曼三種文化，創造而成。從安布羅斯、杰羅姆及奧古斯丁的時代，我們可看到古典與基督教文化的融合；當時，日耳曼文化的影響則剛剛開始。直至第八世紀左右，這三種文化才完成融合，而我們也才可以說西方文化正式誕生了。第六、七世紀期間，我們可以看到這新文化的形成過程。這段騷動多事的時期，教會保留著古典及基督教傳統，西帝國演變而成的國家則在政治與社會組織上發展著日耳曼傳統。不久，日耳曼侵略者（至少在名義上）亦成為基督徒。不過，經過數世紀，兼承希臘、羅馬及基督教遺產的教會，與文化原始而戰爭取向的日耳曼諸國之間，一直有一道文化鴻溝。中古前期的教會只能有限度地保留古典文化，因為不久，教會領袖及上層地主階級都被社會環境改變了。不過，中古前期的教會仍下了很多功夫去教育及基督教化日耳曼民族。

進侵西歐的種族主要似乎來自北歐地區——後來維京人（Vikings）的老家。不久，他們遷入中歐及東南歐，並進擾帝國邊疆。我們很難一概而論他們的文化與組織，因為族與族之間的風俗習慣有相當重大的差異。例如法蘭克民族、盎格魯民族、及撒克遜民族都是農業民族，遷移緩慢，但一旦安定下來，便很難弄走他們。他們沒有受到羅馬文化多少影響，進入羅馬帝國時，仍屬非基督徒。另一方面，西哥德人、東哥德人及汪達爾人（Vandals）則流動頻繁。這三個民族越境而入以前，都早已吸收了羅馬文化，到第四世紀，更都皈依亞里昂派的基督教。不過，儘管有這些差異，各日耳曼種族的政治與社會結構仍流露很多重要的相同點。

關於早期日耳曼民族的制度，當時有人記述下來，是西元九十八年羅馬史家泰西塔斯（Tacitus）寫的一本小書〔日耳曼〕（*Germania*）。此書並不完全可靠，又是一本說教之作，其原意是借較為單純、正直的日耳曼人來批評羅馬帝國人民的「墮落」。不過，無論如何，這本書是研究早期日耳曼風俗、制度的寶貴原始資料。我們可以接受泰西塔斯對日耳曼人的形容：身高體壯、藍眼、泛紅的金髮、生活在簡單的村莊裏；日耳曼婦女享有相當的自主權、受到相當的尊重（以當時羅馬的標準而言）；不過，泰西塔斯誇大了日耳曼民族的操守及品格。其實，他們的劣點並不少於羅馬帝國人，他們只是比較簡單而已。他們的個人衛生亦欠佳：一個五世紀的羅馬國民便曾這樣說：「嗅不到野蠻人（意指日耳曼民族）氣味的鼻子是有福的。」

日耳曼民族用鐵做工具及武器，但他們的經濟結構，從很多方面來說，仍使人想起石器晚期的文化。他們的主要活動是農作、畜牧及戰鬥。他們族與族及人與人之間常用暴力。若一個人被殺，死者的親屬便羣集起來對付兇手及其親屬。為了減少實在太普遍的暴力、流血、仇恨，一種習俗便建立起來——兇手可以付一筆「撫卹費」（*Wergeld*）給受害的親屬，以安撫其怒氣。「撫卹費」的數額多少，視受害人的社會地位而定。較輕微的傷害（例如切斷手、腳或手指等），則付較少的數目。不過，兇手未必付款；受害者或其親屬亦未必接納。總之，儘管多方遏止，世代血仇的事件在進入中世紀以後很久，仍層出不窮。

早期的日耳曼人對血緣親屬相當重視，但血緣仍不能與其「武士誓盟」（*Comitatus*）相比。「誓盟」是武士結合起來對領袖或帝王的忠貞表現。「誓盟」奠基於領袖與部下之間的忠誠、勇敢及互相尊重。在戰場上，領袖需要勇敢、威

猛地帶領部下。若戰死，則即使大勢已去，其部下基於榮譽，仍需奮戰至死。這種英雄式的行為，直貫中古早期，成為歐洲武士貴族的獨特意識形態。

「誓盟」是部族的分支，部族的成員因忠貞於首領或君主，以及遵守共同的習俗法例，遂集結為一。日耳曼民族的法例若與羅馬帝國的法律相比，當然原始。被告需要經過「嚴格考驗」(“Ordeal”)，以決定是否有罪。例如：他可能需要拿著燒紅的鐵，走一段距離，或往裝滿滾水的大鍋裏拿起一塊石頭。經過數天，他的手如果復原，則顯示無罪。若他的手發炎，則表示他有罪。又他可能被綁著放下湖、塘；他若下沉，即表示無罪，若浮起，則表示有罪：因為他們認為潔淨的水不會「接納」罪人。這種日耳曼的習俗（而不是精巧的羅馬法典）支配著西歐中古初期的法治。羅馬法律只是支離破碎或變形地延續著。直至十二世紀，羅馬法典才漸漸復現於西歐，而即使那時候，它對日耳曼法律的勝利也只是漸進且不完全的。

日耳曼法律雖粗糙，對西洋思想有一大貢獻：它認為法律來自人民的遠古習俗而非統治者的意向，因此既然法律超越帝王權威，帝王就不是絕對的。中古初期，帝王常把習俗寫成文字，他們小心翼翼，與一羣貴族商討後，才敢稍作更改。立憲的政府原理尚要等待數世紀才清楚顯現，但其根實始於此。

在野蠻民族正式入侵前的幾個世紀，許多日耳曼部族都發展著還算穩定的王朝。開始時，可能是由一些天賦才能出眾的武士與其「誓盟」貴族創立王朝；不久，這些王朝的君主宣稱他們是神的後裔。當一個君主死去，族的會議便選其家中最有才幹的繼位。繼位者可能是、但未必是其長子。族的會議有相當權力去推選繼位人，其主要功效在第五世紀入

侵時顯見：日耳曼部族由智勇雙全的君主或領袖帶領著；而西羅馬帝國，在位盡是愚弱昏庸之主。

十九世紀的歷史家指出：若干日耳曼結構似乎包含著憲法思想及主權在民的種子。又曰：「民主」始創於日耳曼的森林中。不過，我們應該明白，對約定俗成的「民間法律」的尊重，或者部族會議的重要政治地位，並非日耳曼所獨有，而是許多原始民族所共有之事。意義重大的不是早期日耳曼君主受到風俗法例的限制，而是有限君權的制度在中古世紀不斷發展。

入侵

很久以來，日耳曼民族已威脅著羅馬帝國。一世紀時，他們曾擊敗一支羅馬軍隊；二世紀、及於三世紀中葉，亦曾深入羅馬帝國。不過，直至四世紀末期，羅馬軍民都能夠趕走這些侵略者。但三七〇年代開始，精疲力竭的帝國卻面對著規模空前，不斷加深的日耳曼壓力。日耳曼民族受到富庶、肥沃及陽光普照的地中海世界所吸引，不再把帝國視為破壞的目標而視之為享受的地方。他們一向希望得到羅馬帝國肥沃的土地，但突然變得緊急，因為亞細亞游牧民族的一支匈奴人 (the Huns)，正向西方迫來。這些凶猛的騎士把日耳曼民族逐一征服，使他們成為附庸。東哥德便是這樣成為他們的附庸。另一哥德部族，西哥德人，躲在羅馬帝國多瑙河邊界後面，才得以保全。東羅馬帝國皇帝瓦倫斯 (Valens)——一個亞里昂教派的狂熱分子——同情這些信奉亞里昂教派的西哥德人，於三七六年，把整族人收容於帝國之內。

問題幾乎立刻便出現：貪污的帝國官員欺騙這些西哥德

人，他們作亂報復。終於瓦倫斯要親自出師，但他對軍事愚昧無知，三七八年，亞得里亞堡（Adrianople）一役，全軍覆沒。亞得里亞堡之敗，無比重大。瓦倫斯的繼承人狄奧多西亞一世終能安撫西哥德人，但未能驅逐他們。三九五年，狄奧多西亞駕崩，兩個兒子把帝國分為東、西兩部統治。東、西帝國從此不曾復合於一君之下。狄奧多西亞死後不久，一個凶猛的東哥德領袖阿拉里克（Alaric），領導其部族燒殺擄掠，威脅到義大利本身。四〇六年，絕望的西羅馬帝國急召萊茵河邊界的軍隊，阻擋阿拉里克的入侵，結果，汪達爾人及其他野蠻民族得以越過不設防的萊茵河而進入高盧（Gaul）。不久，羅馬軍團放棄了遙遠的不列顛——毫無防備的不列顛漸漸為盎格魯人（Angles）、撒克遜人（Saxons）及其他日耳曼戰鬥部族所統治。四〇八年，西羅馬帝國僅存的英明將軍遭昏庸無能的霍諾流斯大帝（Emperor Honorius）處死；之後，霍諾流斯自羅馬逃避至沼澤地帶的雷文納。四一〇年，西哥德人進入毫無阻擋的羅馬，領袖阿拉里克准許其部下在羅馬城搶掠三天。

羅馬城淪陷被屠，沉重地打擊帝國的士氣。聖杰羅姆獲知浩劫時，「咋舌哽咽而不能言」。不過，從歷史透視而言，這只是西羅馬帝國分裂過程裏一項意外事件而已。東哥德人很快便交還羅馬城給其昏庸帝王，北往高盧南部及西班牙，在那裏建立王國（直至八世紀他們才被伊斯蘭征服）。同時，其他部族亦分別建立他們的王國。汪達爾人掃過高盧及西班牙，渡過直布羅陀海峽，進入非洲。四三〇年（聖奧古斯丁逝世那年），他們攻陷他的家鄉希坡城。一個汪達爾王國建立於北非洲，以古代迦太基（Carthage）為中心。汪達爾人幾乎立刻便變為地中海的海盜，劫掠船隻及沿岸港市。汪達爾海盜粉碎了地中海的長期寧靜，並打擊西羅馬帝

國逐漸衰落的商業貿易，使之一蹶不振。

五世紀中葉，匈奴由其凶猛的領袖「上帝之鞭」（the Scourge of God）阿提拉（Attila）帶領，直迫西歐。四五一年，在高盧給一支羅馬、西哥德軍隊打敗，但翌年再度進逼羅馬，所到之處，肆行塗毒。西羅馬帝王只好放棄羅馬城。羅馬主教（教皇）李奧一世（Leo I）則北上與匈奴人談判，試圖說服匈奴離去。奇怪地，利奧的使命成功了：匈奴離開了義大利半島——可能是因為匈奴軍隊受不了義大利的天氣，又或者教皇李奧的威嚴震懾了阿提拉。不久阿提拉死去，匈奴帝國崩潰，匈奴人也從歷史中消失（沒有人哀悼他們）。

西羅馬帝國的最後數年，其司法範圍只限於義大利半島，且受制於日耳曼血統的軍事冒險者。羅馬皇帝仍繼續統治一段時期，但日耳曼血統的將軍是掌握實權者。四七六年，奧多維加將軍（Odoacar）覺得繼續這樣沒有什麼意思，遂廢去最後一個西羅馬皇帝，把帝國的飾物送往康士坦丁堡，並把農田充公，以養活其日耳曼部隊，確立其主權於義大利。數年後，不再受匈奴控制的東哥德人由其機敏、狡猾的帝王狄奧多里克（Theodoric）領導，進佔義大利，征服奧多維加，建立一個強大的日耳曼王國。

四九三至五二六年，狄奧多里克統治著義大利。他比其他日耳曼帝王較欣賞及尊重羅馬文化；在其王國，亞里昂教派的東哥德人及正統（基督教）的羅馬人共同和諧地生活、工作在一起，修築渠道，興建新的屋宇，長期受到擾攘不安的半島獲得若干程度的繁榮。政治及經濟氣候得到改善，便帶來一個小型的學術復興，對於希、羅文化之轉入中世紀，頗具貢獻。在狄奧多里克王朝任高級官員的哲學家鮑耶修斯（Boethius），其哲學作品及翻譯，成為其後五百年西方學校的基本教科書。他的經典著作，〔哲學的慰藉〕（*The Con-*

solation of Philosophy) 寫於晚年，當時他已不受政府重視，並受監禁。書的主旨認為，遭遇不幸，並不能影響有德者的內在生活。鮑耶修斯這種哲學主要是來自柏拉圖及其他異教哲學家的思想。他本身是個正統基督教徒，但基督教思想在〔哲學的慰藉〕中從未明顯出現。儘管如此，這本論著在整個中古時代都深受歡迎。

狄奧多里克的私人秘書卡西奧多魯斯 (Cassiodorus) 也是一個相當傑出 (略嫌喋喋不休) 的學者。卡西奧多魯斯是一個富有的羅馬貴族，晚年在義大利南部私有土地上主持一間寺院。如杰羅姆一樣，他命其僧人抄寫及保存古代 (基督教及異教) 的文學作品。影響所及，當時較年輕的聖本篤 (St. Benedict) 創立了一個影響重大的修會，也重視手稿抄寫，因而推動後世西歐的僧人都繼續這種工作。

狄奧多里克統治義大利之際，另一日耳曼君主克路維 (Clovis, r. 481-511) 在從前羅馬帝國的高盧省建立一個法蘭克王國。克路維所受的羅馬教化，不及狄奧多里克，而且其人更加粗蠻。他擅長的政治技巧是邀請政敵晚宴而謀殺他們。不過，克路維的王國竟是日耳曼各王國中最持久的一個。法蘭克人既是好農夫，也是優秀的兵士，他們在高盧奠定了深遠的淵源。此外，法蘭克王朝受到天主教會的熱烈支持：因為克路維從未接觸過亞里昂教派，他是直接皈依羅馬天主教的。在法蘭克一帶，亞里昂教派因而沒落，我們亦可預見天主教在法蘭克崛起。克路維本人始終是一個野蠻人，但教會把他視作另一個康士坦丁 (大帝)，一個對抗異端亞里昂教派的正統教會保衛者。幾世紀後，「克路維」(“Clovis”) 這個皇家名字的發音漸轉輕柔，成為「路易」(“Louis”)，「法蘭克」人 (the “Franks”) 亦變為「法蘭西」人 (the “French”)。此外，法蘭西王權與教會的友誼亦發展成為歐

洲政治的決定性因子。

五〇〇年的歐洲

至六世紀初，西羅馬帝國已成回憶。其版圖領域，現在是一些日耳曼邦國——這些邦國是近代西歐國家的雛型。狄奧多里克在義大利統領著一個容忍且頗開明的東哥德、亞里昂王朝。野蠻但正統的克路維逐漸完成法蘭克對高盧的征討。亞里昂教派的汪達爾王朝愈來愈腐敗、殘暴，統治著正統基督教的北非洲。亞里昂教派的西哥德人雖被法蘭克人逐離南高盧，然其王朝仍繼續統治西班牙達兩世紀。而盎格魯與撒克遜人正在英倫島嶼建立一些細小、非基督教的王國——稍後成為「盎格魯地」(“Angle-land”) 或「英倫」(“England”)。

日耳曼王國在西歐不斷發展，另一方面，羅馬教皇在歐洲社會開始其重要的獨立角色。我們已看過，五世紀中葉教皇李奧一世成功地說服匈奴撤退、保全羅馬城，因而成為義大利的精神領袖。李奧及其傳人宣稱羅馬主教——教皇——是教會的最高權威，並根據聖安布洛斯的例子，堅持在精神事務方面，教會高於國家。教皇是教會最高領袖，而教會應自國家體制獨立出來；教皇提此教理，是明智地把本身的形象由沒落的西羅馬皇帝分隔開來。在五世紀，教皇這些教理只是說說的文字而已，但影響深遠，終至不斷把東、西部的教會分開。更重要的：這也開始了中古時代的政、教鬥爭。這時相距教皇威勢最盛的中古高峯時代仍有數世紀，但我們已可從李奧一世的強硬自主窺見點滴。西部帝國已亡，但永恒的羅馬仍自稱為世界的主宰。

第三章 東羅馬帝國(拜占庭)的延續

東羅馬帝國的生存

到第六世紀，西歐已分爲很多日耳曼血統的國家。不過，以康士坦丁堡爲首都的東羅馬皇帝仍統治著廣大的地中海東部地域：自巴爾幹至小亞細亞、敘利亞及巴勒斯坦（Palestine）而至埃及。東方的人口一向多於西方。東方的文化比西方古老，其文明根源也更深；東方城市又較大且數目更多。在羅馬的黃金時代，東方仍是帝國的工商業中心，而當災難來臨時，東方亦證明比西方更具彈性。

此外，東帝國享有重要的地理、政治及戰略優勢。堅固的康士坦丁堡保護著小亞細亞，日耳曼民族因而不能侵入這個人力及資源的寶庫。幾個世紀以來，這個省份都是拜占庭軍隊及皇室稅收的來源。災難性的第五世紀裏，日耳曼部族進侵西部省份，小亞細亞成爲帝國的堡壘。其勇猛、忠貞的軍隊使東部皇帝不需要選擇另一危險的政策：完全倚賴受僱的日耳曼軍隊。

東帝國的康士坦丁堡有小亞細亞豐富的資源及人力，得以摒擋日耳曼人的進侵。這偉大的城市，「新羅馬」，統治著黑海及地中海的通道，穩守著海、陸兩路成爲東帝國的經濟、政治心臟；只要康士坦丁堡保持不衰，帝國便可以持

續。數世紀裏，康士坦丁的城牆擋住日耳曼及亞細亞部族（波斯及回教）的進侵。在這種形勢分析之下，我們可以了解日耳曼部族何以寧願在比較薄弱的西邊經營建立國家。

在這關鍵的第五世紀期間，東帝國的治術也勝過西帝國。西帝國衰亡之際，一系列英明的東部皇帝小心翼翼地管制資源，擴充財富，增強康士坦丁堡的防衛。優良的領袖，無疑大有助於東帝國渡過災難。不過，如果不是首都的優越戰略地位，以及持續的商業及人力、資源，帝王亦未必能力挽狂瀾。

拜占庭政府

拜占庭帝國的文化是三種文化的融合：羅馬、基督教及希臘—東方文化。東帝國師承羅馬的法制、官僚體系及行政原則。誠然，拜占庭政府是三、四世紀羅馬政制的嫡裔。拜占庭的專制政治根源於羅馬晚期對皇帝（例如對康士坦丁）的崇拜。皇室對拜占庭教會之控制，亦可溯源於康士坦丁大帝及狄奧多西亞一世的政策。晚期羅馬皇帝的重稅亦持續著，而拜占庭帝國的生活也始終艱苦不穩定。

拜占庭的政治氣氛一如晚期（西）羅馬帝國，只顧「自守」及「自保」。對拜占庭人民來說，他們的國家像怒洋中的文化方舟，他們不惜代價，要保存這政治及基督教信仰文化。這個國家的優點在防衛而不在擴張；在謹慎而不在冒險。

這種防衛及保守的氣氛充分顯現於拜占庭的政府及軍隊。這個傳統及龐大的政府厭惡改變，亦甚少冒險。這種政府固然限制了活力充沛而且富於想像的皇帝；不過，當無能的帝王掌政，它也使帝國維持於不墜。規模小但精練的軍隊

配合著不輕冒險的政策；老練的將領，也常採用計謀及謹慎的政策。他們都明白：要保存帝國，軍隊是決定性的關鍵。

拜占庭的基督教（東正教）

拜占庭的皇帝從忠心而熱情的基督徒人民得到無比珍貴的支持力量。帝國內，正統的基督徒統治者成為神在人世間的副手，是神聖教會的保衛者；因此，帝王乃得到人民完全、絕對的效忠。所以，拜占庭軍隊不只為帝國而戰，也是為神而戰；武士不只是士兵，而可說是「神聖戰士」。基督教成為鼓舞愛國主義的刺激因子，而拜占庭帝王所享有的廣大人民的支持，也是從前異教時代聞所未聞之事。

不過，皇帝在拜占庭基督教的中心地位既可生力量，也是弱點之由。宗教紛爭是帝國大事，異端也對國家構成嚴重威脅。五、六世紀尤多教義紛爭；最後，這些宗教糾紛令帝國損失慘重。當時，流傳最廣的異教是「神人同性論」（Monophysitism）。該教興起於埃及而迅速蔓延至敘利亞及巴勒斯坦，形成對正統帝王的一股敵視氣氛。東正教與「一體教」的爭論點在於：東正教認為基督的人性與神性是分為二的，一體教認為二者合一。一體教的基督只有一性：其神性勝過人性。因此，一體教被視為回復古代近東的靈魂教，而他們認為世俗是邪惡的；一體教這種二元神論（即邪物對善靈理論）與東正教義的神成肉身理論發生衝突。

一體教亦可被視為「抗議」教派——其教徒生活於未受羅馬統治以前即已開化的地區，他們把希、羅文化混和於本身比較古老的文化。即使沒有一體教，埃及和敘利亞人民也會抗拒拜占庭；而一體教雖不能構成反叛的藉口，仍正好是

近東人民對抗希、羅統治的一種反抗工具。

東正教與一體教之爭既長，而且深遠，並構成拜占庭帝國一統的威脅。皇帝深信教義一統是國家存亡的關鍵，然其政策搖擺不定。他們有時迫害一體教徒，有時懷柔他們；又有時作成教義上的妥協以滿足雙方，而事實上令雙方都不滿。無論皇帝採取什麼政策，這爭論一直都是政府的傷口；直至七世紀，當富有的一體教省份被回教勢力吞併，爭論才完結。六八〇年，在康士坦丁堡的會議上，拜占庭的東正教才取得國內的決定性勝利。

拜占庭文化

羅馬的政府、基督的宗教及希臘與東方的文化乃拜占庭文化三大支柱。而這三大支柱都受第四世紀基督教帝國的經驗所影響，因此，拜占庭承繼了羅馬政府的晚期集權形式。拜占庭的基督教（東正教）直接源出羅馬帝國晚期的基督教——其神學因對抗亞里昂教派而顯得嚴格，其教會則受制於皇帝的權勢。正如康士坦丁大帝於三二五年在尼西亞會議（Council of Nicaea）中控制教士，同樣地，拜占庭的皇帝亦統治著康士坦丁堡的教士。

拜占庭的希臘、東方文化也受到三、四及五世紀學術、文化思潮的影響。拜占庭繼承的希臘文化並不是雅典文化。培里克利斯（Pericles）時代的古典建築、戲劇、及雕塑等已隨著年代的轉變（尤其在三、四世紀）而數度改變。重點放在來世的氣氛漸漸影響羅馬的文化而使古典精神產生劇變。一股神秘的精神一向潛伏於希、羅文化，與古典傳統重視現實的觀念並存。現在，神秘的力量愈來愈大，愈來愈多知識分子轉向神學，抄寫經文及追尋個體的永生。藝術家不

再描繪身體的美而較有興趣於描繪神聖的東西。新的基督教藝術，身體緊裹，露出嚴肅的面孔和深陷的眼睛——靈魂之窗。古典時代的藝術家把透視的技巧發展到極高水準，但這新時代不予重視，也不再重視身體的真實感，帝國晚期的藝術家側重於濃厚的、閃耀著宗教的莊嚴氣氛。

這就是拜占庭所承繼的藝術傳統。這個傳統與拜占庭精神相得莫逆，使東帝國的藝術家製造不朽的藝術品，而且毋需背離東帝國的基本美學形式。拜占庭式的宏偉教堂相繼興建，如康士坦丁堡的聖蘇菲亞（Sancta Sophia），雷文納的聖維塔（St. Vitale），及威尼斯的聖馬可（St. Mark's）——內部都閃耀著聖徒與政治家、基督與聖母的金底鑲嵌畫像。這些藝術與古典希臘的極不相同：技巧不同、目標不同，但結果一樣成功。

在這個新的、超然（出世）的環境裏，希臘文化有重大改變。但拜占庭文化仍舊是希臘文化。希臘文是大部分人民的語文。儘管他們篤信基督教，他們永不曾忘記希臘傳統。的確，羅馬帝國晚期轉變至拜占庭文化的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出，拉丁羅馬漸成過去，而希臘色彩則漸濃。時移勢易，拜占庭學者忘記了拉丁文；希臘文成為皇室語言。拜占庭教會在康士坦丁堡主教領導下，與羅馬教皇失去聯繫。希臘的哲學與文學由學者根據希臘的過去而發揚光大。

查士丁尼的時代

拜占庭文化的第一個偉大時代是查士丁尼在位期間（527-65在位）。從很多方面來說，查士丁尼可算是最後一個真正的羅馬帝王；另一方面，他是一個如假包換的拜占庭皇帝。他使用拉丁語，並常夢想重建西邊的古老羅馬帝國。在他的

領導下，不同源流的羅馬法典獲得整理而合併為一體。在這方面，他是繼承羅馬傳統的統治者。另一方面，他的時代也是拜占庭藝術的黃金時代，在往後數世紀裏，代表了拜占庭文化典型專制政治的高峯。

查士丁尼之治的偉大成就除了是查士丁尼天才的成果，也有賴其先世小心、明智的統治，使帝國倖免於日耳曼之侵入，以及照顧著帝國的財政資源，使國庫漸漸累積了一筆可觀的盈餘。查士丁尼亦可說幸運：他決心要征討西部，而該處日耳曼王國已失去其早先的銳氣。東哥德王狄奧多里克在查士丁尼登基前一年（即五二六年）死去，曾經殘酷壓迫北非的汪達爾王朝亦已腐敗不堪。

查士丁尼是一個果決而雄心無限的人，正好把握著這些機會。他得到其雄心萬丈、充滿理想的妻子狄奧多拉皇后（Empress Theodora）的輔政。狄奧多拉原是一個賣藝女郎，兼為青樓中人。她有天生過人的實務智慧，與查士丁尼共同為保守古舊的政權加上新的動力。重建康士坦丁堡、改革羅馬法典，及光復西部等計劃，通常都歸功於查士丁尼，但因為他事事都與狄奧多拉相商，所以，我們實不能分辨究竟是誰的主意。無論如何，如果沒有狄奧多拉的堅強意志，這些政策都不能有效執行。在位初期，一次大暴動幾乎燒光了康士坦丁堡。城堡大火，暴徒迫近皇宮之際，查士丁尼差點兒要放棄皇宮逃命，狄奧多拉令他回復勇氣。她拒絕逃命——她宣佈準備以皇后之身殉亡。因為她的堅定，暴亂終結而政權得以保存。

查士丁尼的政策，在其時代雖相當成功，但也虛耗了帝國元氣。他用他可觀的神學知識，調和正教及一體教（他本身信東正教，而狄奧多拉則有一體教派的傾向）；但他複雜的妥協未能滿足任何一方。暴亂之後，他斥空前巨資，重建

康士坦丁堡。重建計劃中，最有名的聖蘇菲亞教堂是拜占庭首屈一指的藝術品，內部裝飾有金、銀、象牙及閃耀的鑲嵌畫；外部的巨大圓頂則似在天空飄浮。這座建築令世人震驚：包括查士丁尼本人。據說，他慨嘆道：「光榮歸於上帝：他給我力量完成如此（偉大）工程！啊！所羅門王（Solomon），我已超越你。」

查士丁尼召集一羣才學出來的法律家，研究羅馬法律的先例、司法見解、以及詔書。這些資料被重整，輯成龐大而有系統的〔民法大全〕（*Corpus Juris Civilis*）。查士丁尼這部〔大全〕不但成為將來拜占庭法治的基石，更是十二世紀西歐重振羅馬法向日耳曼法例挑戰的工具。〔大全〕在十二世紀西歐的出現，對歐洲國家精微及理性的法律體系有其不可量度的重要性。的確，其影響力仍活現於近代國家之法律中。不過，〔大全〕的重要性更甚於上列諸事：羅馬法典原來含有濃厚的主權在民成分，但，經查士丁尼之手，加入了拜占庭的專制獨裁精神。因此，中古晚期及近代初期的歐洲，傾向於支持專制政治，與日耳曼傳統法律裏的有限王權概念相抗。中古晚期及近代初期的歐洲君王十分欣賞查士丁尼「皇詔就是法律」的名言。

史家常批評查士丁尼虛耗本身有限的資源去收復西部帝國。從一個角度來看，這些史家是對的：收復西部的戰役的確虛耗了國庫，而查士丁尼的軍隊在西部的勝利又甚短暫。不過，查士丁尼深信羅馬帝國的傳統，不甘坐視，遂全力收復西部省份，並重建羅馬的帝王權威。他的軍隊雖少，但由英明的將領帶領，於五三三至五三四年從容征服北非腐朽的汪達爾王國，並自東哥德人手中奪回西班牙的地中海沿岸地帶。其軍隊在義大利與西哥德人奮戰二十年，最後幾經艱苦、努力，於五五五年擊敗西哥德人。這些義大利的戰役，

史稱「哥德戰爭」(“Gothic Wars”)，使義大利半島與羅馬淪為一片焦土。四一〇年，哥德人搶掠羅馬城，其損毀程度遠不及查士丁尼這些「哥德戰爭」。

查士丁尼政權的最後數年，差不多統治整個地中海沿岸，不過，如此擴張的帝國，卻因此赤貧、破產。狄奧多拉死於五四八年，查士丁尼失去賢內助，意氣全失，且優柔寡斷。此外，五四一至五四三年，瘟疫橫掃拜占庭及西歐，並且間歇重現，奪去很多生命，創傷了拜占庭的經濟。不過，即使沒有瘟疫，拜占庭亦不能控制新佔有的土地。查士丁尼的軍力集中於西歐，故不能阻擋斯拉夫人(Slavics)與保加利亞人(Bulgars)湧入巴爾幹半島。五六一年，來自亞細亞草原的好戰游牧民族亞伐人(the Avars)聚居於多瑙河岸，並進而控制斯拉夫及保加利亞人，拜占庭遂生活於凶猛的亞伐人陰影下，其危險性更甚於過去的(北非)汪達爾人或(義大利)西哥德人。這次新危機顯示查士丁尼的最大弱點——未能平衡理想與資源。他遺下的龐大帝國險象環生。

退守與復興

拜占庭帝國期望成為羅馬，但因為地理政治的現實形勢，它註定是巴爾幹及近東的帝國。查士丁尼的西部斬獲並不持久。他死後三年，即五六八年，一股野蠻的日耳曼部族，名為倫巴人(the Lombards, 長鬍子 Langobards or Long Beards)，湧入義大利，使飽受創傷的義大利再受蹂躪。倫巴人以波谷(Po Valley)為中心，在義大利北部建立一個王國。拜占庭仍擁有義大利南部及雷文納與其他亞德里亞海岸城市，但其對義大利的控制則嚴重受挫。不久西哥德人重佔西班牙南部先前汪達爾人在北非所掠的地方。六九

〇年代，該等地區亦落入回教徒手中。七五一年，倫巴人得到雷文納，拜占庭在義大利的力量更見減弱。

查士丁尼的後繼人被迫放棄其雄心勃勃的政策，面對生存苦戰，不暇西部，而對抗東北方的野蠻民族之直接威脅。波斯帝國緊迫著拜占庭的東部邊疆，而亞伐人及其保加及斯拉夫民族則已控制了大部份巴爾幹。

赫勒克里斯大帝王朝(Emperor Heraclius, 610-41在位)發生一次大危機：波斯軍隊攻佔敘利亞、巴勒斯坦及埃及；六二六年，康士坦丁堡被波斯及亞伐人圍攻。赫勒克里斯於六二八年擊敗波斯軍隊並收復失地。他也成功地在巴爾幹重建皇室權威。但不久，回教軍隊在阿拉伯地區迅速擴張，自拜占庭帝國手中奪去敘利亞、巴勒斯坦及埃及，並再威脅康士坦丁堡。回教徒數度圍困康士坦丁堡。七一七至七一八年，拜占庭的防衛不但保衛了帝國，亦使東、中歐免受阿拉伯侵佔。帝國抗拒了著伊斯蘭的強力攻擊，保有康士坦丁堡、小亞細亞，及不穩定地管理著巴爾幹半島，因而保持著中古歐亞西部三大文化的分域：拜占庭、伊斯蘭、及西歐基督教。西歐的基督教各國得以在康士坦丁堡之掩護下發展。

馬其頓(Macedon)的皇帝；斯拉夫人的同化

拜占庭幸有足夠時間去逐漸同化東南歐。第七世紀期間，拜占庭重要中心如大馬士革、亞歷山大(港)，安太奧克(Antioch)及迦太基淪入伊斯蘭之手，因此，帝國變得更小、更窮，不過，在宗教與文化方面也變得更一致、更一統，並且全面集中於唯一的大城市：康士坦丁堡。

經過數代退守，拜占庭在馬其頓王朝(867-1056)期間

又再擴張：包括文學及藝術復興及土地擴張。傳教活動亦使無數斯拉夫人皈依東正教。拜占庭在馬其頓王朝時代的政治及宗教擴張，支配著東歐未來一千年的文化發展。

馬其頓人重佔敘利亞北部，並且往東北開拓其小亞細亞疆土。不過，長遠而言，其最重要的軍事成就，是對巴爾幹與保加利亞人確立強硬的拜占庭統治。王朝最偉大的統治者巴西爾二世（Basil II, 976-1025 在位）——「保加利亞的剋星」——在巴爾幹年年征戰，於一〇一四年擊潰保加利亞人的軍隊，並進而粉碎所有抗拒力量，確立拜占庭皇室權威。

同時，九世紀中葉，東南歐在宗教與文化方面的拜占庭化漸趨熱烈。受稱頌為「神派往斯拉夫民族的門徒」的傳教士，如西里爾（Cyril）及梅索迪奧斯（Methodius），不斷在南斯拉夫與俄羅斯民族中努力，引導他們皈依拜占庭的基督教及文化。西里爾及梅索迪奧斯在第九世紀下半葉，發明了斯拉夫字母，用之以創作斯拉夫文聖經及禱文。因此，斯拉夫文字與斯拉夫基督教會同時出生。至此，馬其頓時代終於把巴爾幹及俄國帶進東正教及拜占庭文化的領域。

俄羅斯的皈依

馬其頓時代的同時，亦可見到在帝國政治領域以外，俄羅斯的興起。拜占庭對黑海北岸地區一向有經濟與政治利害關係。第九、十世紀，黑海與波羅的海之間貿易頻繁，使拜占庭帝國與維京世界亦有頻密的商業往來。無數拜占庭錢幣在北歐發掘出土。北歐人亦常受聘為拜占庭傭兵。九世紀，瑞典維京人深入俄羅斯，並在貿易中心諾夫戈拉德（Novgorod）建立王朝，統治該地的斯拉夫人，以後並與他們通婚。第十世紀期間，一個諾夫戈拉德統治者佔據了俄羅斯的

戰略兼商業城市基輔（Kiev）。基輔後來成為俄國第一個重要中心。

在康士坦丁堡的馬其頓帝王，盡心盡力，與基輔維持和諧的外交關係。巴西爾二世（保加利亞的剋星）要接受基輔王弗拉迪米（Vladimir）的軍援，並答應以親妹嫁給弗拉迪米。結果，基輔皈依東正教，因為，弗拉迪米娶了拜占庭公主而同意皈依基督教。基輔在政治上未曾皈依拜占庭皇帝，但其人民成為康士坦丁堡教主的精神子民。

十一世紀，基輔的俄羅斯政治瓦解；十三世紀，蒙古攻佔該地，但其拜占庭東正教文化仍然保存。十六世紀，拜占庭帝國覆亡之後，信奉東正教的莫斯科王繼稱為凱撒（沙皇）（Caesar [Czar]）。康士坦丁堡是「第二個羅馬」，所以他們意圖把莫斯科變成「第三個羅馬」，他們統領政、教，亦如其康士坦丁堡的「先輩」般。有些學者認為：現今俄羅斯的領袖，統領政治與（共產）黨於一身，正是承繼著拜占庭政教合一而受制於皇室的傳統。

軍事大敗而文化延續

馬其頓王朝於一〇五六年終結，其偉大、充滿衝動的時代亦成過去。一股新興而強勁的亞洲部族土耳其（突厥 Turks）移入中東。他們剛皈依伊斯蘭教，並在巴格達成立一個傀儡附庸。一〇六五年，他們自拜占庭手中奪去亞美尼亞（Armenia）；帝國軍隊嘗試趕走他們，卻在一〇七一年的曼奇克托戰役（Battle of Manzikert）中遭他們殲滅。

曼奇克托戰役是拜占庭歷史的一大轉捩點。土耳其人雖未有效地乘勝追擊，然帝國對小亞細亞的長期控制自此喪失。同年，南義大利的諾曼人攻佔拜占庭在亞得里亞海岸的巴里

港 (Bari)，顯示拜占庭的西歐勢力正式終結。這時，西歐基督教世界逐漸具備偉大文明的資源與力量，拜占庭要向法蘭克人及羅馬教皇求助了。曼奇克托戰役的世紀以第一次十字軍東征及其攻陷耶路撒冷 (1099) 為終結，戰勝回教徒的英雄不是拜占庭戰士，而是法蘭克十字軍。拜占庭苟延至十五世紀中葉，但不曾復振。其擴張的時代已過去，而其精力只夠用於掙扎求存。

不過，拜占庭文化，經曼奇克托戰役的打擊之後，仍延續不輟。藝術及學術繼續著；即使是在其悠長歷史的結尾 (1453)，拜占庭仍正進行古典人文文化復興，顯然影響著義大利的文藝復興。

由始至終，拜占庭尊崇古典傳統。它是希、羅文化的保衛者，給西歐文化無價的幫助。學者在康士坦丁堡研讀羅馬法典及希臘哲學與文學，西歐中古基督教文化深受其影響，正如一位近代史學家所說：「深遠而處處受益：其鑲嵌畫與搪瓷，其紡織與象牙，其珠寶與瑪瑙，其繪畫與金製作品，都小心保養於西歐寶庫。」(Romily Jenkins, *Byzantium, The Imperial Centuries*; New York, 1969, p. 385)

不過，拜占庭政治從未能超越羅馬帝國晚期的君主專制或其基本的自衛態度。拜占庭的活力被其保守態度所阻，他們認為，比起創造，保存無價的傳統更值得。

拜占庭對歐洲歷史最長遠的貢獻，在於使俄羅斯與巴爾幹皈依東正教。東正教的基本教義與西歐相似，不過，它們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東正教的東歐文化來自拜占庭，其接受西化影響，比伊斯蘭或印度或佛教文化容易。東歐現今是西化了，但並不完全是西方模式。文化相似，但似中有異；工業化了，但對西方的議會民主體制並不完全習慣。其各地歷史傳統都不同，而且相當複雜。拜占庭傳統就是其中一項。

第四章 初期的西方基督教世界

西方中古初期的貧乏無知，與拜占庭的繁榮正成強烈對比。不過，西歐的勝處是它新開始，前途實無可估計；它受到古典傳統的感應與滋潤，卻不受其束縛。

日耳曼入侵後，西歐脫離羅馬帝國的政府體系。教會延續著很多方面的古典文化。不過，日耳曼君主和貴族都不能保存古羅馬的政治與經濟體系。第三世紀以來，西歐的城市已衰落，至六〇〇年，已面目全非。阿爾卑斯山以北的古代城市政府已完全消失。不過，有些城市仍能延續，經過一些改革而成為教會政務中心，是中古時代教會總部及主教的大教堂所在地。很多城市成為重要的朝聖中心，因為大教堂擁有聖物——聖骨或聖衣，這些被視為治理精神及肉體的工具。例如：在都爾 (Tours) 的大教堂，擁有著名的顯靈者聖馬丁的骸骨，據說很多觸摸過的人都因而痊癒。

這些教會中心在中古初期的文化與經濟方面，只扮演小角色。更重要的是寺院、農村、及羅馬或日耳曼貴族的大莊園；小型的奢侈品貿易仍持續，但大致上，六、七世紀的經濟是自給自足的。小型的農村社會自給自足，因為他們生活寒儉，不多作需求。

此外，我們有理由相信，西歐有些廣大耕地棄置不用，很久之後才再有人居住。法國南部的空中照相，可見中古田

地的典型：自中央的農村散發開去，但通常這些散發開去的田地，原來的底子井然有序的羅馬式方形和長方形田地。因為中古初期並沒有中央政府去作徹底的土地改革，我們的結論是羅馬的田地荒棄後，經過幾世代，再為人所耕種並改革。由空中照相，無法確知年代，不過，這段劇變很可能與西羅馬覆亡時的暴亂及人口銳減有關。

政府、知性生活

除了狄奧多里克之外，其他日耳曼君主都無法持續自己所繼承到的羅馬行政傳統。他們任令羅馬稅制崩潰、鑄錢的特權流入私人之手。國家的權力與財富每下愈況。這並不是因為帝王慷慨，而是因為他們無知。他們根本不知何謂負責任的政府，視其王國如私有莊園，隨意剝削。他們任意賜贈土地與公權給貴族和教會，視其餘為私有財產，任自己享樂。總之，他們集無政府與暴政於一身。

羅馬帝國晚期，西歐在稅賦與管理上都過分嚴苛；現在則是三不管地帶。日耳曼君主完全不理經濟，也不想改善貧窮。教會填補真空，作種種慈善事情，但仍不足以應付西羅馬覆亡後的亂局。其組織主要限於衰落的城市與孤立的寺院，後來才漸漸組成鄉間教區，因應鄉村的需要。八世紀之後，鄉村教堂成為西歐教會的特色之一。但初時，農夫若能一年見一次教士，就算幸運了。當時的兩大地主：君主與教會，對一般農民來說，只是大地主而不是正義與聖寵的泉源。農村生活是艱苦的，而且遠離政治和精神（宗教）生活。

西歐的學術生活亦如其政治及經濟生活般落後。古羅馬的文化已腐去，而新的西歐文化才剛開始。第六、七世紀，

西歐的學術水平可從幾位著名學者窺得一般。都爾的格列哥里主教（死於五九四年）的著作〔法蘭克人的歷史〕(*History of the Franks*) 是克路維王朝的最佳史料。他可算是當代有名的史家。但該書充滿拉丁文文法的謬誤。格列哥里描繪的世界是野蠻的、殘暴的、充滿迷信幻想的。他所呈現的故事，以及他的呈現手法，都證明第六世紀高盧文化的沒落。

格列哥里大教皇 (Gregory the Great, 死於六〇四年)，學術成就與安布羅斯、杰羅姆及奧古斯丁並譽為拉丁教會的四位博士。不過，格列哥里大教皇的文章，雖顯示深遠、務實的智慧及心理透視，然亦受其時代文化式微的影響。其文章並不如四世紀的博士般深入、精微地探討哲學和學術問題。格列哥里大教皇把奧古斯丁的神學簡化，以遷就其本身時代的需要。奧古斯丁的深奧神學理論被他變為集中於次要的問題，如魔鬼與聖物。

塞維爾的伊西德主教 (Bishop Isidore of Seville, 死於六三六年) 被譽為其時代的優秀學者。他最負盛名的著作〔語源〕(*Etymologies*) 本來冀望成為一本包羅所有知識的百科全書。它是當時的一本珍貴作品，在其後很多世代亦受採用。不過，伊西德缺乏批判能力，這本作品的價值大為減低。他收入他能夠找到的一切資料，不管那些資料是可靠、抑或是荒謬的。我們可以說：他太倚賴古代作者，而那些古代作者都過份輕信事情；他也受害於羅馬的貧弱科學傳統。不管怎樣，這位當代最偉大的思想家是天真的。他描繪怪物如下：「人們稱那些怪物為辛羅塞法里 (Cynocephali)，因為他們有狗頭及野獸的叫聲。他們生於印度。賽克洛斯 (Cyclopes) 也是生於印度，他們得此名字，因為他們前額中間有一隻獨眼，……。生於利比亞的布林米斯 (Blemmyes) 據說是無頭的，口和眼生在前胸；另一些生來沒有脖子，眼

睛長在肩膀上。……塞西亞(Scythia)的班羅地(Panotii)，據說耳朵大到包裹全身。……據說衣索匹亞(Ethiopia)住著西奧波德斯(Sciopodes)，是行動敏捷的獨腳怪物，……夏天裏，他們仰臥地上，以其巨腿遮蔭。」最後，伊西德以懷疑的筆法，作個結論：「據說還有其他人類怪物，其實不然；他們是幻覺而已。」以其處理怪物的方法去評價伊西德，似乎不公平，因為他取材自古代的資料。不過，他的確融合古代的「荒謬」資料與他自己當代知性上的放肆於一體。

日耳曼王國

五〇〇年至六〇〇年的一個世紀期間，西歐基督教文化的政治結構出現重要轉變。五〇〇年，狄奧多里克的東哥德王朝統治義大利，汪達爾人統治北非洲，西哥德人統治西班牙，克路維及其法蘭克人進據高盧，盎格魯·撒克遜人則開始定居英倫島。一個世紀之後，其中兩個王朝被查士丁尼的軍隊擊潰：北非不再屬於汪達爾人，而是屬於拜占庭，義大利的東哥德王國則已覆亡。

至六〇〇年，盎格魯·撒克遜民族已佔據大部分的英倫島，把土著的塞爾特人變成奴隸，或者把他們趕往威爾斯西部山區，或英倫海峽彼岸的不列顛尼。其時，盎格魯·撒克遜王國是一堆細小而獨立的王國，而基督教正在當地發展。

西元六〇〇年的高盧，完全由法蘭克人支配，統治者為梅洛文加(Merovingian)王朝創始者克洛維那些殘酷且無能的繼承者。這個王朝沿用法蘭克的習俗，帝王死後，兒子均分王國。兒子常內鬩，直至其中一個成為法蘭克人的唯一君主為止。他死時，王國又傳給兒子，內鬩鬧劇又重演。梅

林文加政府每下愈況，而法蘭克教會也變得分裂及腐敗。

西班牙的西哥德王朝與教會也變得腐敗。其君主於五八九年放棄亞里昂異教而皈依天主教，六二四年，從拜占庭手中奪回地中海地方。不過，西哥德君主的大權漸漸旁落於貪心而殘暴的地主貴族。七〇〇年代初期，回教勢如破竹地征服該王朝。

義大利在狄奧多里克死後的一個世紀裏，災禍連連，查士丁尼恐怖的哥德戰爭之後，倫巴人接踵入侵。至六〇〇年，殘碎的半島可分為：拜占庭佔領雷文納及南部，亞里昂的倫巴人佔據北部。教皇名義上用拜占庭法律，管治羅馬附近一帶的土地；他為了保持脆弱的獨立，只好玩其倫巴牌。不過，在緊急關頭，他仍仰拜占庭為保護者。

創造力

以上描繪的，就是西歐在六〇〇年的情況。乍看之下，這一片黑暗裏似乎毫無希望。但是，這個社會生出了西歐文化。這是個雛形時代——創生的時代，其中一些微妙的趨勢會變成主宰歐洲歷史路向的傳統。即使是六〇〇年，黑暗中已露曙光。古典文化仍存在，只不過形式慘遭庸俗化而已。伊西德並不能與奧古斯丁相比，但也絕不是野蠻人。教會雖受環境影響而顯得無知及腐敗，然仍保有若干鼓舞、啓蒙及文明的能力。

北方，聖巴特瑞克(St. Patrick)在第五世紀把基督教傳到愛爾蘭，至六〇〇年，該處更蔚成充滿創造力的塞爾特·基督教文化。愛爾蘭的學者通曉希臘與拉丁文學，而當時其他西歐地方對希臘文卻一無所知。第七世紀晚期，愛爾蘭作家抒發著流暢的塞爾特文采。愛爾蘭基督教發展著與衆

不同的習俗，組織是圍繞著寺院而不是教區，其領袖是僧侶而不是主教，愛爾蘭僧人則以學識廣博、生活聖潔及傳教活動地域廣泛而馳名。他們使大部份的蘇格蘭地區皈依基督教，在六〇〇年代初期，更向歐陸傳教。

修道院

修道院是中古初期最具動力及最富意義的機構。傾慕修道院生活，並不是基督教獨有的，其他宗教如佛教與猶太教——隨便舉兩個例子——亦然。猶太教中，可能製造了著名的死海經卷的埃森斯(Essenes)教派，便是一種猶太修道院組織。很多宗教人士都渴望避世，以便專心與神相處。不過，基督徒在這方面特別強烈。修道院生活成為基督徒生活的最完善方式——如基督所說：「任何人爲了我的名而離棄家庭，或兄弟、或姐妹、或父母、或妻兒、或土地的，將會獲得一百倍以上的報酬和永生。」(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九節)。

這種避世與克制在第三世紀晚期，當埃及的聖安東尼退隱沙漠，過其禁慾生活時，首先影響基督教。不久，其聲名遠播，一羣嚮往者追隨左右。自此，安東尼組織了一個隱士團體：各隱士只生活一起，卻互不交流。不久，類似的隱士團體在埃及和帝國的其他區域盛行起來。四、五世紀，出現了很多隱士聖人。其中之一是「柱上苦行者」聖西門(St. Simeon Stylites)。他獨自生活在六十呎的柱頂上，達三十年，引起廣泛的仰慕及仿效。

同時，一種比較務實的修道制度也在成長中。以合作而不以隱居為基礎的修道團體始於四世紀初的埃及，並迅速發展至羅馬帝國全境。這種合作式的修道團體吸引了無數虔誠的基督徒(他們對自滿的四世紀教會感到失望。)沙漠中的

神聖個人主義及柱上聖徒逐漸沒落，興起一種比較有秩序組織的修道生活。不過，早期的團體仍是鬆散的，並繼續強調嚴格的絕食以及使人淨化的鞭笞——此等行徑由古代的隱士首創，而且仍迷惑不少近代生理學家。

聖本篤及其寺院

紐西亞的聖本篤(St. Benedict of Nursia, 約480-544)改變了西歐修道制度的路向，以常識與實際的組織原則調和其過度高昂的神聖色彩。本篤年輕時逃離貪污腐敗的羅馬，隱居於尼洛別宮殘蹟附近一個山洞。不久，聖名遠揚，於是門徒羣集。結果，本篤不只是隱士，亦是一個有敏銳心理洞察力的人——一個精明的組織能手。年輕時代的各種經驗，使他領略何種修道生活是最完善的。他出生於羅馬貴族家庭，具備羅馬人特有的實務天才與秩序意識。他創設數間修道院，不但引來一些未來的聖徒，也吸引了一般民衆，甚至包括一些富有的羅馬貴家子弟。終於，他在羅馬與那不勒斯(Naples)之間的一個山巔，建立他偉大的卡西諾山修道院(Monte Cassino)。此後幾個世紀，卡西諾山成為西歐主要宗教生活中心之一。它成為修道院的模範，有一套鉅細包羅而同情體貼的清規。本篤在查士丁尼的哥德戰爭期間去世，但他的清規繼續影響並啟發西歐。

格列哥里大教皇形容聖本篤的清規：「以其慎篤而放異彩」。近代學者發覺它源自一種比較早期而無名的修道院規律，不過，聖本篤給它一種比較人性而可行的新性質。它提供的生活十分繁忙且規律化，簡單而非毫不容情地禁慾。本篤修院的僧侶衣食充足。他們的生活是敬奉上帝而獻身於聖潔的生活，但也是任何虔誠基督徒都能過的生活。外界的

殘暴，使這種生活更顯得吸引人。修道院的日子充滿各類仔細安排的活動：集體頌禱、唸經以及工作——農田工作、院內工作、以及抄寫經文——視修道院的需要及僧侶的能力而定。基本的守則是：貞潔、貧儉、及服從；僧侶必須獨身，他必須離棄所有個人的財物，他必須服從其長老。長老由僧侶選出，為終身職，是寺院的絕對主人，不過，他有所決定，必與眾僧侶商量。他向神負責，並根據修道院清規而視事。他要小心，不可使僧侶難過，不宜過度驅策他們，不可使他們有理由作「正當的咕噥」。此點就是格列哥里教皇所指的「慎篤」本質，無可懷疑的，這也是本篤修道院成功的主要因素。

本篤修道僧的貢獻

本篤死後不足兩世紀，本篤清規已傳遍西歐基督教世界。不過，結果並不是一個聖統結構的巨大修道院組織，而是很多個別、獨立、自主的修道院，他們共同遵守本篤清規，但行政上則互不相干。本篤視其修道院為虔誠之人可能避世而來的精神殿堂。不過，早期西歐基督教世界很混亂，文盲社會亟需本篤僧侶的紀律及學問，使他們不能捨世俗事務而不顧。

因此，事實上，本篤僧侶對他們棄絕的俗世有很大影響。西歐中古初期，大部份識字的人都是他們的學校所栽培的。他們成為保存及傳送古代拉丁作品的文化橋樑。他們把基督教的矛頭伸入日耳曼的森林；後來更刺入北歐、波蘭、及匈牙利。他們成為帝王的秘書和顧問，並且擔任教會政務的高位。虔誠的教徒不斷經年累月的捐贈土地給他們，本篤僧侶於是擁有並經營龐大地產；這些產業後來成為明智的農

業組織與技術革新的模範。當封建社會逐漸出現，擁有廣大土地的本篤修道院長老成為諸侯，在他們控制的廣大地區上負責政治與法律行政，以及徵兵。最重要的：在政治渾沌的汪洋裏，本篤修道院是安全與學問的島嶼；古典、基督教、及日耳曼文化逐漸融合，行將成為歐洲文明的基礎，而它們就是這一個融合過程的精神與學術中心。總之，本篤修道院成為早期西歐基督教世界裏最重要的教化力量。

格列哥里大教皇

本篤僧侶的傳道受到教皇熱烈且寶貴的支持。格列哥里大教皇是首任出身自本篤修道院的教皇，他深切了解本篤僧侶的既有傳道功能，又可以向四方宣揚教皇的威德。

上文已提及格列哥里大教皇也是個學者——他是奧古斯丁思想的發揚光大者。他的神學在未來數世紀極具影響力，然未能超越其時代的「貧乏」智識水平。他真正的天才是對人性的深切了解及其政務與組織的才能。他寫了一本極為通俗的聖本篤傳記，令本篤運動受到廣泛的注意及支持。他的〔牧者的照顧〕(*Pastoral Care*) 分析主教職責，是一本充滿實務智慧與常識的傑作。此書解答了很多當時的問題，成為中古時代最受廣泛閱讀的作品之一。

格列哥里喜愛修道院生活，升任教皇時，由衷遺憾。一聽到自己獲選為教皇，他躲藏起來，後來被人拖進聖彼得教堂去接這個聖職。不過，接受新職後，他便竭盡所能，發揚教皇權威。他深信教皇是聖彼得的繼承人，是教會的合法統治者。他重整教會產業的財政結構，用因此增加了的收入行善，救濟當時的窮人。他的完整人格、智慧、及政務才能，使他幾乎成為羅馬及義大利中部的皇帝——威嚴遠超過當時

極力佔據義大利半島的倫巴人及拜占庭人。他當時未能立刻改革法蘭克的教會，但他派出本篤僧侶往盎格魯·撒克遜傳道，卒使法蘭西及日耳曼納入教皇的轄治。

英格蘭的皈依

帶領本篤僧侶往英格蘭傳道的是「另一位」聖奧古斯丁（並不是早先那位希坡的偉大神學家聖奧古斯丁）。五九七年，奧古斯丁及其僧侶抵達英格蘭的肯特王國（Kent），展開他們重要的工作。英格蘭當時分為數個獨立的日耳曼王國，而肯特是當時最強大的。肯特王埃塞爾伯特（Ethelbert）有一位基督教太太，所以奧古斯丁受到友善的款待。傳道工作十分順利。五九七年的聖靈降臨節（Whit Sunday），埃塞爾伯特王及其成千人民受洗（為基督徒）。王國的主要城市「肯特城」（“Kent City”）或「肯特（伯里）堡」（Canterbury）成為教會總部；奧古斯丁本人成為肯特伯里的第一任大主教。在其影響下，埃塞爾伯特用英格魯·撒克遜文字製訂首套法律。

其後幾十年，英格蘭的本篤派基督教與盎格魯·撒克遜諸王國的命運共升、降。埃塞爾伯特王死後，肯特衰落；六〇〇年代中葉，政治中心北移往諾森伯利亞（Northumbria）。在這遙遠的地方，當時的兩大創造力量相遇：由蘇格蘭的寺院南移的愛爾蘭·塞爾特基督教，碰到自肯特北移的羅馬本篤派基督教。

這兩股力量雖有共同信仰，卻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修道院生活方式及教會組織，甚至計算復活節日期，它們的方法也不同。英格蘭未來與歐陸及教皇的關係，繫乎這場相遇：若塞爾特勝利，則英格蘭可能會脫離西歐基督教發展的

主要路向。不過，六六四年，諾森伯利亞王奧斯維（Oswy）決定採行羅馬本篤基督教，教皇對英格蘭的影響力才獲得確立。五年後（即六六九年），教皇派學者塔蘇的西奧多爾（Theodore of Tarsus）接任肯特伯里大主教，並重整英格蘭教會。因為諾森伯利亞的皈依及西奧多爾大主教的努力，英格蘭在短短一個世紀內便成為西歐最具創造活力的基督教社會。

塞爾特基督教與本篤基督教第七世紀在諾森伯利亞的這次交會，產生了一場饒富意義的文化波動，是為諾森伯利亞文藝復興。該兩傳統互相影響、互相刺激，在這遙遠的土地上造成了西方基督教文明的高峰。六〇〇年代晚期及七〇〇年代初期，以塞爾特曲線大膽裝飾的手稿、新經文、活力充沛的方言史詩，令人印象深刻的建築，使諾森伯利亞文明大放光芒。諾森伯利亞文藝復興以愛爾蘭及本篤修道院為中心，尤其是賈勞（Jarrow）的本篤修道院。當代最偉大的學者聖比德（St. Bede the Venerable），便是在這裏渡過一生。

比德自幼進入賈勞，直至七三五年去世於此。他著作等身，最偉大的〔英格蘭教會史〕（*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England*）顯示其批判力遠超中古前人或當代學者。這本〔教會史〕是我們研究英格蘭歷史的主要資料來源，是第一本使用近代常用的基督紀元來編年的重要歷史著作：（如A. D.—Anno Domini—「基督」主誕生之年）。比德的編年革新反映其對歷史的一統與目標有深切感受：要傳揚基督福音及修道院生活，去改變世界，尤其是英格蘭。〔教會史〕反映當代文化的領域及一位有深度的思想家；它確立了比德的地位——希坡的聖奧古斯丁以來最偉大的基督教學者。

比德去世時（七三五年），諾森伯利亞王朝已失去其政

治霸權，其文化亦開始衰退。不過，在第八世紀，一些英格蘭本篤傳教士把學習的傳統傳回歐陸。七四〇年代，英格蘭僧侶聖鮑尼法斯（St. Boniface）改革法蘭克的教會，溶入本篤寺院的理想，將其組織制度化，並使之更接近教皇。格列哥里教皇已作古一百四十年，但其精神仍在。聖鮑尼法斯及其英格蘭傳教士在萊茵河東部建立了很多本篤修道院，並開始展開對日耳曼基督教化的悠長而艱巨工作。（一如奧古斯丁及其僧侶使肯特王國皈依基督教）。七〇〇年後期，基督教文化由英格蘭向南移往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方興未艾的帝國。查理曼王朝的首要學者阿昆（Alcuin）是一名來自諾森伯利亞的本篤僧侶，更是比德的徒孫。

教會與西方文化

西部與拜占庭為主的東部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最明顯的是西部的低水平文化。不過，同樣重要的是，西部教會比較能夠獨立發展，不受政府干涉。西部政、教雖常攜手合作，卻從未有如康士坦丁堡或其他古代文化般之政、教融合。初期的西部基督教世界，特徵為文化與政治分離：文化由教會及修道院領導，而政治力量是在日耳曼君主手裏。這分離使西部文化更具彈性及活力，產生的創造張力使西部不停滯、多變化，朝著一連串文化高潮邁進，並步向更多更新的學術、精神、思想組合。日耳曼諸邦的軍事文化、教會與修道院的古典，基督教文化有如聖奧古斯丁所謂的兩個城邦，不斷在融合。不過，它們從未完全溶合。這兩個領域的相互作用，主宰著中古文化的發展。

第五章 伊斯蘭的勃發

背景與起源

伊斯蘭、拜占庭及西歐基督教世界是中古西部歐亞的三大文明，而西歐基督教世界在繼續下來的幾世紀裏一直是最原始、最不發達的。它從伊斯蘭和拜占庭學習了很多東西；而其融合古典、基督教及日耳曼傳統，亦得助於上述兩個鄰居文化。不過，由於西歐人仇視「異教」的伊斯蘭教徒與「叛逆」的拜占庭人，他們對西歐基督教文化的影響也受到阻滯。第八、九世紀，西歐與伊斯蘭的接觸，大多限於戰場；一〇〇〇年後，它才開始向豐富的伊斯蘭思想與文化遺產學習。

今天，伊斯蘭是一個特殊文化，也是一個活生生的宗教，傳遍南亞、中東、北非——由印尼至巴基斯坦，至西南亞的阿拉伯世界，以及地中海一帶的非洲。這龐大的伊斯蘭地帶是在第七世紀由一股尚武而勇不可當的阿拉伯宗教所創造的，並以驚人的速度向外擴張。出生以後的一百年內，伊斯蘭粉碎了基督徒控制的地中海基地，毀滅了波斯帝國，佔有了拜占庭最富庶的省份，吞併了西班牙，壓迫著法蘭克的心臟地域，並且深入南亞。

穆罕默德 (Muhammad)

在先知穆罕默德(約571-632)時代之前很多世紀，阿拉伯半島(今沙烏地阿拉伯)的游牧民族經常侵襲巴勒斯坦、敘利亞及美索畢達米亞北部的富裕及文明地區。很多亞述人侵略者和古代近東的帝國建立者原本是從阿拉伯沙漠來的——例如亞摩列人(the Amorites)、迦勒底人(the Chaldeans)，迦南人(the Canaanites)，甚至希伯來人(the Hebrews)。這些民族很快吸收了肥腴月灣的古代文化，並且創造更新。不過，他們留在阿拉伯的同胞則仍舊原始而漫無組織。

在穆罕默德時代，大部份阿拉伯人仍然過著游牧生活，以及信奉雛形而多神的宗教；不過，新的文化已經開始影響他們。一條從阿拉伯南部向北伸展的駱駝隊商路線連繫著遠東、拜占庭及波斯帝國間的商業網系統，城市文化沿著這條路線而發展。其中最大的商業城市，麥加(Mecca)，成為繁忙的商業中心，其駱駝隊商向南、向北暢行，得中間人之利而致富。這些商業生活與新的外來思想漸漸取代部族生活。五七一年前後，先知穆罕默德在這個麥加城誕生。

穆罕默德誕生時，查士丁尼已逝世六年。當代偉人包括格列哥里大教皇及塞維爾的伊西德主教。五九七年，羅馬本篤僧侶抵達英格蘭肯特傳道時，穆罕默德二十餘歲，外界並不認識他。

這位伊斯蘭教的建築師，出身麥加的一個式微貴族。他只受過很少正式教育，故只能成為一位駱駝商隊商人。他的遊歷，使他與猶太教、基督教及波斯的拜火教有密切接觸。他是一個敏感、堅強而有說服力的人。三十多歲時，一次神

秘的體驗後，他開始講道，並以寫作來申述他的新信仰。在麥加，只有他的妻子、親戚、及一些來自低下層的人支持他。支配麥加的商人並不接受這個「出身寒微的暴發戶」。他們似乎害怕他的新宗教會破壞麥加的主要廟宇喀巴(Kaaba)的聲譽；喀巴神廟內放置著一塊神聖的隕石，也是有利可圖的朝聖中心。他們認為穆罕默德的信仰會毀壞麥加的朝聖生意。他們失算了；不過，他們的仇視迫使穆罕默德於六二二年逃離麥加，暫居於麥加以北二百八十里的麥地那鎮(Medina)。

這次出奔麥地那，伊斯蘭教徒慣稱為「黑齒拉」(Hegira)，是伊斯蘭教發展史上一個重要轉捩點，而且成為伊斯蘭曆的元年。穆罕默德很快贏得麥地那居民對其信仰的支持，並成為該鎮的政治與宗教領袖。在穆罕默德的領導下，宗教與公民權融合為一；這神聖團體同時是政府、又是教會。這方面，穆罕默德在麥地那的團體已顯現著後來伊斯蘭王國的結構。

麥地那人向麥加發動戰爭，侵襲駱駝隊商，封鎖他們的貿易。六三〇年，麥地那征佔麥加，並使它加入神聖團體；穆罕默德成為傳奇人物，他在世最後兩年間，半島上很多部族自動歸順。穆罕默德於六三二年死時，已把阿拉伯人聯合成前所未有的政教合一團體。他們的組織、武備都優良，並且受到新而有力的一種宗教所鼓舞。這些沙漠民族的精力被引導朝向單一目標前進：征服世界，以及使所有人皈依伊斯蘭教。

伊斯蘭教

信仰是穆罕默德用來聯結阿拉伯人的黏合劑。這個信仰

名為「伊斯蘭」，阿拉伯語的意思是「服從」。穆罕默德教導其信徒必須服從獨一無二、宇宙全能的神——阿拉——的意旨。穆罕默德並不把自己當為神，他是一系列先知中最後兼最偉大的一位。以前的先知有摩西、新舊約聖經的先知、以及耶穌，而穆罕默德是他們的「封疆」。

伊斯蘭教尊重新、舊約聖經，並相當容忍猶太與基督徒——「聖經的人」。但伊斯蘭回教徒有他們的聖經〔古蘭經〕(The Koran)。它取代了以前的聖經，而且回教徒相信它包含純正的神聖啓示成分。〔古蘭經〕是穆罕默德寫的全書，是伊斯蘭教信仰的基石。據說：人和妖怪合力，也寫不出這種書來。伊斯蘭教徒識這本書是阿拉說的話，由天使加百列(Gabriel)頌讀在天堂的原書給穆罕默德寫成。因此，其神聖權威不只在其意思，甚至每一個字(共三十二萬三千六百二十一個)皆然。任何翻譯都屬異端。所有伊斯蘭教徒都要用阿拉伯語讀〔古蘭經〕。伊斯蘭教擴展時，阿拉伯語亦隨之而擴展。

〔古蘭經〕可能是最多人閱讀過的書。它不只是一本信仰的書，也是阿拉伯人以外的伊斯蘭學習阿拉伯語的課本。又由於它不只是宗教，也是法律、科學及人文學的權威，所以，它也成為伊斯蘭教學校每一學科的標準課本。穆罕默德成功地把一種簡單的語言，如第七世紀的阿拉伯語，運用於精細的宗教、法律及倫理觀念，天才清楚可睹。

信徒如果過著正直、誠實的生活，並遵守伊斯蘭規則，穆罕默德保證他們可得永生。最重要的，他們都有個簡單信念：「世上除了阿拉，別無他神，而穆罕默德是他的先知。」伊斯蘭有責任參加祈禱和齋戒，一生至少往麥加朝聖一次，並全心全意為擴展神聖團體而工作。聖戰是備受讚揚的活動，因為，為信仰而服務，與為國家而服務，是同樣好的。

在伊斯蘭的地方，公衆法律由宗教認可，穆罕默德在麥地那建立的這種政教合一體制成為伊斯蘭社會的基本特色。伊斯蘭的司祭及「寺院」都與國家是一體：穆罕默德的政治繼承者也是信仰的保衛者兼信徒的守護者。因此，中古的西歐政教鬥爭在伊斯蘭世界絕對不會出現。

早期的征戰：六三二至六五五年

穆罕默德死後一年中，阿拉伯人受其教義駕馭的勃發精力立即向世界開展。他們的征服成就如此驚人，部份是因為伊斯蘭的年輕魄力，也有部分是因為對手疲弱。拜占庭的赫拉克里斯皇帝擊敗波斯人不久，兩者都因長期的戰爭而耗盡衰竭；而敘利亞與埃及的神人同性論者仍與拜占庭東正教的主人對敵。

阿拉伯人懷著滿腔宗教熱誠，並受文明世界的財富奢華所誘惑，而進入這些疲憊不堪的土地。阿拉伯人並沒有全盤的征服計劃，很多戰役都由探險式的搶掠而引發。不過，他們的氣勢隨著每次的意外勝利而增強。六三六年，他們進入拜占庭的敘利亞，殲滅一支龐大的拜占庭軍隊；他們攻佔大馬士革(Damascus)和耶路撒冷(Jerusalem)。到六四〇年，阿拉伯已佔領敘利亞的所有土地，使它差不多從此脫離拜占庭的控制。六三七年，他們大敗波斯軍隊，並進入波斯首都克特西逢(Ctesiphon)：該地的財富令他們目眩神迷。隨後十年之內，他們把整個波斯征服，進至印度邊境。之後，他們更深入印度次大陸，奠定了現代巴基斯坦(Pakistan)及孟加拉(Bangladesh)等回教國家的根基。波斯人逐漸皈依回教信仰，捨索羅亞斯德(Zoroaster)而奉穆罕默德，備妥了日後在伊斯蘭政治及文化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同時，伊斯蘭向西進入埃及，在六四〇年代佔據亞歷山大港，把這個歷來為希臘科學中心，稍後為希伯萊和基督神學中心的地方，融入伊斯蘭文化內。他們既操縱敘利亞與埃及於手中，遂繼而在海上與一向在地中海東部稱雄的拜占庭爭霸。他們奪得塞普路斯島（Cyprus），突擊羅德斯（Rhodes），在六五五年「船桅之役」（“Battle of the Masts”）大勝拜占庭艦隊。

內戰：六五五至六六一年

西元六五五年，伊斯蘭因王朝陷於殘暴的內戰而暫時停止擴張。麥加的首要商業家族奧美雅族（the Umayyads）與穆罕默德的女婿阿里（Ali）競相爭奪繼任為領袖（哈里發 Caliphate）。阿里所領的集團，在以後幾個世紀裏，勢力發展得非常龐大。阿里的追隨者堅持伊斯蘭的領袖須由穆罕默德的直系後裔繼承。穆罕默德因無子繼嗣，只遺女兒法提瑪（Fatima），法提瑪下嫁給穆罕默德的侄兒阿里。

西元六六一年，奧美雅部隊擊敗阿里，開創奧美雅王朝，並遷都至敘利亞的大馬士革。奧美雅王朝祚長幾近百年。不過，支持阿里的正統派一直是麻煩問題，他們是少數派，忠心耿耿，支持不少阿里和法提瑪的後裔。日後，這政治運動更發展成宗教異端，名為十葉派（Shi'ism）。十葉派眾辯稱真正的伊斯蘭領袖——阿里和法提瑪傳下來的穆罕默德後裔——是不會犯罪、不會錯誤的，而且擁有「古蘭經」以外的一套秘密教義。十葉派成為地下神秘教義，時而以民衆叛亂而顯名於世。十世紀，十葉派教衆控有埃及，遂在開羅（Cairo）開創法提瑪王朝。十葉派引發一股名為暗殺黨（Assassins）的亡命份子。暗殺黨人服用大麻，以求神明啓

示。十葉派運動至今猶盛，但形式不一。

奧美雅王朝：六六一至七五〇年

伊斯蘭因內爭而中止向外擴展，西元六六一年，奧美雅戰勝阿里，重新擴張。奧美雅王朝首都雖不以麥地那，而以大馬士革為都，舊有的阿拉伯貴族依然穩握權力。此時，康士坦丁堡成為伊斯蘭最主要的軍事目標。然而，這城堡仍能擊退西元六七〇至六八〇年間伊斯蘭不斷的重擊。拜占庭的防守有賴一種名為「希臘之火」（“Greek Fire”）的秘密武器輔助。「希臘之火」是一種液體，暴露於空氣即自燃，水亦不能滅之，只有醋與沙才能令之熄滅。西元七一七至七一八年間，一支強大的阿拉伯艦隊進攻康士坦丁堡，無功而還。伊斯蘭耗盡人力物力而攻不下康士坦丁堡，遂放棄取城之圖，拜占庭於是得以繼續多存在七百年，直至中世紀後期，都有效地堵塞伊斯蘭教徒進入歐洲東南部之路。

然而，與此同時，伊斯蘭軍隊在西面卻取得輝煌的勝利。伊斯蘭自埃及向北非海岸進佔遙屬拜占庭的古汪達爾王國。西元六九八年，攻下迦太基。西元七一一一年，渡直布羅陀海峽，進入西班牙，一舉殲滅飄搖欲倒的西哥德王國，將西班牙基督徒統攝於其治下。西班牙的基督徒親王只得置入庇里牛斯山區（Pyrenees）。伊斯蘭繼而進入南高盧，威脅法蘭克人的梅洛文加王國。西元七三二年，即穆罕默德死後一百年，伊斯蘭終為基督徒軍隊挫於都爾與波登亞（Poitiers）之間的戰場，基督徒軍隊統帥為法蘭克的英勇武士——鐵鎚查理（Charles Martel）。

其實都爾一役的基督徒實非前人想像中的純正歐洲基督教捍衛者。他們是長髮的、以狼毛織衣的法蘭克人。無論如

何，如拜占庭之在東南、而法蘭克人則在西面截止好戰的伊斯蘭教徒的擴展。

都爾一役中，伊斯蘭軍隊為數不衆，且僅為權宜之策，實不能與西元七一七至七一八年間圍攻康士坦丁堡的大軍相比。然經此二役，伊斯蘭對基督教文化地區的主要進侵時期亦告一段落。當然，此後基督教與伊斯蘭的軍事衝突及領土的改變依然可見：大部份的西班牙於十三世紀中葉重為基督徒控制；但總的來說，伊斯蘭王國、拜占庭、西歐基督教王國在七世紀中葉以後好幾世紀都維持勢力均衡。

從此，這三個文化並存而各自發展。拜占庭入巴爾幹及俄羅斯；伊斯蘭帝國入南亞；西方基督教王國進入日耳曼、斯堪的納維亞、匈牙利、和波蘭。十字軍東征可說是這概括下的小例外；基督徒重奪西班牙，及塞爾柱土耳其人在小亞細亞壓倒拜占庭，是遠更重要的例外。然而，要到十四世紀鄂圖曼土耳其（Ottoman Turks）的伊斯蘭席捲巴爾幹，這均勢方完全破壞。

阿拔斯（Abbasids）王朝的黃金時代

西元七五〇年，即都爾戰役後十八年，奧美雅王朝被推翻，取而代之的阿拔斯族也是阿拉伯人——一向以來，伊斯蘭的領袖都是阿拉伯人；然而，阿拔斯王朝與奧美雅王朝不同：阿拔斯王朝鼓勵被征服的各高文化民族參與政治。而此時，大量文明種族亦皈依伊斯蘭教。阿拔斯王朝最歡迎已皈依伊斯蘭的波斯貴族，因王朝開創之初，首都由大馬士革遷至底格里斯河（Tigris）流域的巴格達（Baghdad），正在舊波斯帝國的核心。隨著首都的遷移，伊斯蘭帝國的政治重心東移。此舉使伊斯蘭對康士坦丁堡及西歐的壓力稍稍鬆

弛。

阿拔斯族的興起，是阿拉伯貴族政治壟斷的結束之兆。巴格達的新政府由不同種族共同掌理，出身寒微之人亦能臣侍伊斯蘭領袖而致顯赫。一位不滿的貴族說道：「我們當中滿是妾侍的兒子；神啊，引我們到一處沒有這些雜種的地方吧！」

巴格達在早期阿拔斯伊斯蘭領袖統治下，成為世界大城市之一。它是一個籠罩伊斯蘭世界而遠至異域的商业網之中心。絲綢、香料、馥郁的木材自印度、中國、印尼羣島流入。毛皮、蜜糖、奴隸自斯堪的那維亞輸入。黃金、奴隸、象牙自熱帶非洲運入。巴格達是一個廣佈於伊斯蘭世界內，支行遍及各城市的銀行系統之中樞。巴格達開出的支票，可以在西去四千哩的摩洛哥憑票兌現。阿拔斯宮殿佔地達全城三分之一，有無數的房子和公眾房間，太監、女眷和政府官員的住所，更有一間特別的接待室，名叫「樹廳」（“Hall of Tree”），廳內滿佈金、銀製的假樹，樹枝上更有機械鳥歌唱。

巴格達的富裕和文化在哈龍·阿爾·拉術德（七八六——八〇九年）（Harun-al-Rashid）治下達於頂峯。哈龍的財富和權勢成為傳奇故事。哈龍久已慣於接受拜占庭帝國的入貢，有一次貢品中止，他給在康士坦丁堡的皇帝發了以下的專橫字條：

以慈悲、憐憫的阿拉真神之名，
我，哈龍：信徒的指揮，
傳話給羅馬狗，尼斯福勞斯（Nicephorus）：
我讀過你的信了，你這蕩婦的兒子。
至於我的答覆，我要你用眼睛看，
不要你用耳朵聽。再見。

信發出後，一次成功的軍事行動迫使倒運的拜占庭恢復入貢。

哈龍時代蓬勃的知識生活亦同樣出色。伊斯蘭學者研習並揉合希臘、羅馬、波斯和印度的學術傳統。在巴格達，哈龍的兒子兼繼承者設立了「智慧堂」(House of Wisdom)——一個立刻成為圖書館、也是大學、翻譯中心的學術機構。各地的伊斯蘭學者推展伊斯蘭文化，使之超越奧美雅王朝。從不同的古老傳統吸取知識，伊斯蘭文化迅速成長。(西歐)查理曼在教化他粗俗無知的法蘭克民族時，哈龍正統治著燦爛、閃耀的巴格達。

阿拔斯政府大量引入拜占庭和波斯的行政技巧。一個以巴格達為首都的精密、複雜科層組織統治全國，並以稅吏、法官、官差、和間諜，與各省保持聯繫。在對社會公義要求的反應上，雖並不如同時代的其他政府，但阿拔斯王朝的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是開明的。阿拔斯政府進行了廣泛的水利工程，抽乾沼澤，增加耕地。不過，農民和非專業工人的地位，卻因大量奴隸的競爭，而仍然低賤。璀璨的阿拔斯朝文化，並無助於貧乏的大眾。人民除了宗教狂熱之外，仍保持與過去二千年沒有多大分別的生活方式。

阿拔斯王朝的衰落

阿拔斯王朝的權力未能持續控制廣闊的伊斯蘭帝國疆域。帆船和駱駝的緩慢速度，限制了各地交通的發展；邊遠的總督需要足夠的自主權力和軍事力量去抗拒異教徒的入侵。此等地方自主和勢力極易發展成完全自治。西元七五〇年阿拔斯革命之後，接著便是一長時期政治分裂的過程，一省接一省脫離巴格達的控制。即使在哈龍的全盛時期，極西

的省份——西班牙、摩洛哥、和突尼西亞 (Tunisia)——也已由獨立的地方王朝所治。西班牙更從來不曾歸於阿拔斯統治，而一直隸屬於奧美雅的統治者。九世紀晚期，分裂的趨勢更因埃及、敘利亞，和東波斯(伊朗)的脫離而加速。

那時，阿拔斯領袖在巴格達政府裏的權力也逐漸旁落。野心的軍事將領逐漸僭取權力，控制稅收機關與其他政府部門。十世紀後期及十一世紀，開羅法提瑪王朝的領袖勢力崛起，擴展至敘利亞、並曾一度攻佔巴格達。大約十世紀中葉開始，巴格達的阿拔斯領袖更為一自稱「蘇丹」(Sultan)的波斯貴族王朝所控制，由這王朝統治著殘存的阿拔斯之邦。又一世紀以後的一〇五五年，塞爾柱土耳其人的領袖攻佔巴格達，號稱「大蘇丹」("Grand Sultan")，並揮軍拜占庭，所造成的禍害，前已述及。塞爾柱勢力在十二世紀衰落。此後一段時間，伊斯蘭帝國繼續衰落，同時，十字軍出現。十二世紀末，伊斯蘭帝國在敘利亞和埃及重樹勢力，十三世紀，十字軍更被逐走。同一世紀裏，疲弱的阿拔斯王朝政府被摧毀。蒙古人 (Mongols) 於西元一二五八年攻佔巴格達，屠殺大量阿拔斯人民(據說八十萬人被殺)。實際或名義上統治了巴格達五個世紀的阿拔斯王朝乃告結束。

經濟與宗教的改變

西元九五〇至一二五八年間，阿拔斯王朝飽受政治困擾之際，其經濟亦嚴重衰微，貿易枯竭，銀元短缺，無論在巴格達、開羅、或大馬士革，伊斯蘭帝國的統治者均被迫以土地或稅收權賜予從屬，以代替薪俸。故此，帝國主義漸為地方主義取代，財富的象徵是土地，而非商業。

時局動盪不安，更促成民衆對社會經濟與宗教的不滿。

一羣一羣十葉派暴徒四出進行恐怖及革命活動。與此同時，伊斯蘭世界裏，一個近乎異端的「蘇非」(Sufism)運動大盛。好幾個世紀，「蘇非派」運動雖無緊密聯繫，卻是各異教徒在傳教工作方面的主要動力。該派的神秘主義者，多是文盲，異常狂熱，成功地使非洲、印度、印尼、中亞細亞、中國數以百萬計的人信奉伊斯蘭教。在艱苦時期裏帶給羣衆希望的，往往是他們，而非正統的宗教學者和律師。蘇非派吸納了新柏拉圖學說(Neoplatonism)中一切實體操於一神的說法，以神秘方法與神合一，強調真神的慈愛，而不取正統教派強調的神權。伊斯蘭教的正統教士強烈駁斥這股神秘的風氣。然而，到十世紀時，蘇非派已是伊斯蘭王國人民中勢力最大的教派。直至今日，蘇非派仍影響著伊斯蘭教。

伊斯蘭文化·皈依與散佈

整個政治分裂時期，伊斯蘭帝國仍能以共同語言、共同文化、共同信仰維繫；仍繼續與拜占庭爭控地中海諸地。九至十一世紀期間，多次佔據重要的克里特島(Crete)、西西里島、薩丁尼亞島，和科西嘉島。敘利亞、埃及與北非的大部分居民，雖曾支持過熱誠和組織完善的基督教教會，但，早在哈龍主政時期，他們已改奉伊斯蘭。伊斯蘭通常並不迫害基督徒，僅課以賦稅而已。長期的賦稅負擔，比起殘酷逼害，是使人改信伊斯蘭的更有效方法。

哈龍時期開始的知識醒覺持續維持了四個世紀。過去沙漠上野蠻的阿拉伯人，現在成為希臘、羅馬、波斯、印度的文化傳人。穆罕默德死後不足二百年，伊斯蘭文化已經達到成熟、精密的境界。所以有這個活潑的成長，是因為阿拉伯人成功地吸取被征服者的文化傳統，作成新且獨特的綜合。

伊斯蘭學者參考、採納，而從不盲目吸收。他們汲取外來文明，轉化為己有。

九及十世紀政治分裂之際，文化也隨而普及整個伊斯蘭世界。例如：十世紀時，奧美雅西班牙的首都哥多華(Cordova)擁有驚人的財富，並成為百花齊放的文化中心。哥多華人口約五十萬以上，是另一個「巴格達」。西歐沒有一個城稍為比得上它的人口、財富或市政組織。顯赫的巨宅、清真寺、輸水道、浴場；熱鬧的市場、商店；有效率的警隊、衛生隊；街燈；輝煌、塗上五彩瓦片、由優美的寺院和閃爍的噴泉圍繞的皇宮——哥多華是當代的奇蹟。

遍及整個伊斯蘭世界，自哥多華至巴格達，並遠及東方，伊斯蘭學者與藝術家發展著古代文明的遺產。建築師把希羅建築物塑造出優雅而獨特的新款式。哲學家不顧狹隘的正統神學家的敵視，研讀並闡述柏拉圖、亞里斯多德的著作。醫生發展著蓋倫(Galen)及希臘醫學理論，描述新症狀、發明治病的新藥物。天文學家及占星家濃縮了托勒密(Ptolemy)以地球為中心的天文系統說，繪造準確的星座移動圖表，給衆星起了現在仍用的阿拉伯名字，如金牛座(Altair)、天鵝星座的一等大星天津(Deneb)等等。十一世紀波斯著名的天文學家兼詩人奧馬開嚴(Omar Khayyam)設計了一種極準確的曆法。伊斯蘭的數學家活學活用希臘和印度的知識，從希臘人那裏學了幾何及三角；從印度數學發展出代數(阿拉伯語：al Jabr)，並發揮所謂阿拉伯數目字——由一至九的一套數字符號(再加〇)——此法後來西傳，使歐洲數學發生革命性的變化。

伊斯蘭文學並沒有長篇或有系統的巨著，但有短小的詩與散文精采作品。其人物軼事比長篇故事為優。伊斯蘭詩人致力於短詩，而少作長篇、連貫的組詩。奧馬開嚴的四行

詩看來是按字母順序排列，而非按照全盤的構思。而〔古蘭經〕本身出自穆罕默德的寫法完全沒有組織，穆罕默德死後不久，即為人由長而短排列，仍不求結構上的統一。〔古蘭經〕的持久價值在於每一章每一節的力量和美。

穆罕默德死後一世紀內，阿拉伯人的征討，永久並決定性地改變了北非及西南亞的歷史。阿拉伯人的軍隊、信仰、語言征服了遼闊的土地。最後，無論種族背景如何，從摩洛哥到伊拉克的每個伊斯蘭都可以「阿拉伯」一語概稱。在它包融的宗教和語言架構裏，阿拉伯文化為以前的帝國裏文明悠久的各民族提供了新的刺激和方向。它多方面的成分和豐富的伊斯蘭傳統，日後在十二、十三世紀給西方的思想提供了無價的滋養。稍後，伊斯蘭軍隊摧毀拜占庭，康士坦丁堡乃成為伊斯蘭城市。更後期，即十六、十七世紀，他們到達維也納的邊境。只有到十九世紀時，伊斯蘭帝國才從屬於西方的軍事與政治。而今日，有明顯徵兆顯示，這從屬又告一段落。

第六章 卡洛林王朝的歐洲

卡洛林時代的重要性

八世紀，西方基督教世界開始浮現為一個連貫的文明，此事要歸功於卡洛林帝國；卡洛林帝國由法蘭克王查理曼和他英明的祖先，把各片土地併合而形成。在這個帝國內，組成歐洲文明的不同文化要素——古典、基督教和日耳曼文化——首次出現某種程度的融合。查理曼是日耳曼君主，他把日耳曼武士貴族結集在身旁，禮聘教士和古典學者，並認真扮演西方教會的保護者和支持者。其帝國雖基本上是日耳曼的，其文化生命（不管如何的有限）則極依賴古典基督教傳統。這些文化的融合，在卡洛林王朝中、在其日漸興隆的教會內、以及在查理曼本身，皆顯而易見。

查理曼的法蘭克，與其同時的拜占庭及伊斯蘭的阿拔斯帝國形成強烈對比；巴格達和康士坦丁堡是燦爛、貿易及富裕文化的中心，查理曼的法蘭克人則是半開化的野蠻人。但八世紀的西歐人民，正穩定地朝著對他們及其後繼者具有更大意義的生活邁進。部分歐洲人初次開始醒覺他們是獨立的民族，是「歐洲人」——擁有雅典、耶路撒冷、日耳曼及羅馬文化融合而成的嶄新、獨特文化，而他們是這文化的代表。與拜占庭人民和伊斯蘭教徒相似，歐洲人也由其共同信